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GEORGE



SOROS

索罗斯 论全球化

ON GLOBALIZATION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罗斯论全球化/[美]索罗斯著;王荣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ISBN 7-100-03623-2

I. 索... II. ①索... ②王... III. 资本主义社会—研究 IV. 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396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SUǒ LUÓ SÍ LÙN QUÁN QÍU HUÀ

索 罗 斯 论 全 球 化

[美] 乔治·索罗斯 著

王荣军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3623-2 / F·446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 1/4

印数 10 000 册

定价: 11.00 元

目 录

前言	1
志谢	7
导言 全球资本主义的缺陷	11
第一章 世界贸易组织	35
第二章 国际援助:缺少的要素	57
第三章 结构性改革:多边发展银行	93
第四章 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3
结论 迈向全球开放社会	137
附录 特别提款权建议	162
索引	167

前 言

vii

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不仅是为阐明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更是为提出改善的办法。出于这一目的,我采用了对全球化的一种颇为严格的定义:我将它定义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全球金融市场及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日益加强的支配。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缩小讨论所关注的范围。我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际机构的发展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同步,而我们的政治安排则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基于这些前提,我提出了一系列实际可行的建议,它们可以使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更稳定、更公平。

我之所以写作本书,是因为我看到了一种无意中的联盟,它由极右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极左的反全球化积极分子组成。他们本同床异梦,但联起手来之后,却 viii形成了破坏或削弱我们现存国际机构的威胁。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想组建另外一种联盟,这个联盟的使命就是改革和加强我们的国际机构,并创造我们所需要的

2 索罗斯论全球化

新机构来解决导致人们目前的不满情绪的那些社会问题。诚然,我们现存的国际金融与贸易体系 (IFTIs)^① 还有些缺陷,所有的机构都难免有缺陷。这正是改进这些机构的理由,而不是将其毁坏的依据。

我认为自己具有一些非同寻常的资格来从事这项事业。在全球金融市场里,我一直是一名成功的实干家,这使我能以一个内行的眼光来看待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一直积极地参与弥补经济全球化种种缺陷的努力。我建立了一个包括许多基金会的网络,专门负责促进我所称的开放社会 (open societies) 的发展。我认为,目前形式下的全球资本主义是一种扭曲的形式,它本应是全球开放社会。虽然我只是金融市场里众多专家中的一员,但对人性未来的积极关注使我独树一帜。我将过去五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全球化的缺陷,并就这一问题写了几本书和几篇文章。我撰写的上一本书即《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② 在提供解决办法方面着墨不多。从某种意义上

① 我把国际金融机构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FIs) 和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揉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新术语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trade organizations)。

② 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其中译本已由商务印书馆于 2001 年出版,王宇译。

说,我撰写本书的目的,也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人们常常对我说: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获利和试图对该市场进行改革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我看不出有什么矛盾。我之所以热衷于改进已使我获得成功的国际金融体系,其目的是为了使这个体系变得更持久。从时间上说,我的这一兴趣产生得比我进入金融市场早。我是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经历了纳粹和苏联占领时期。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对一个人的福利和生存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深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①的作者卡尔·波普哲学的影响。在成为对冲基金管理人取得足够的成就后,我立刻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即开放社会基金会(现在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去“开放封闭的社会,帮助开放的社会更好地成长,并培养一种严谨的思维模式。”那是1979年的事。起初,这个基金会主要关注的是使那些封闭的社会开放,后来,在苏联帝国崩溃以后,则注重促进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而最近致力于^x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的弊端。本书就是这一事业的副产品。

^① 1944年出版。

4 索罗斯论全球化

在努力建立改革和加强我们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的联盟的过程中,我碰到了—个困难:动员公众反对某种东西,总是比动员他们支持某种东西容易得多。一个建设性的议程必须足够普遍化,能满足人们的愿望,但又须足够具体,以便能形成一个以它为中心的联盟。这样一个议程不可能由个人单独提出。因此,我将书稿向各色人等广为散发,征求他们的反馈意见。我收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评论和批评意见,并把其中我认为很有道理的那些建议融入了最终的成品。我相信最终定稿的书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纲领,这个纲领公众可以支持,世界各国政府也可以执行。本书的中心内容是提出了一个建议,用特别提款权(SDRs)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公共物品。这个方案不能治愈全球化的所有弊病——什么方案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它应有助于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2001年9月11日,我打造最后成品的工作进展顺利,恐怖分子也在此时发动了袭击。这一事件造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环境。我觉得这书当时所谈的还不够深入。它局限于提出一套我在“9·11”之前认为是切实可行的建议,但并未详细阐述促使我写作本书的对全球开放社会的构想。眼下这个时候正是这种观念获得大

家注意的大好时机。仅仅对恐怖主义宣战是不够的；人们还需要对前面那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正确认识。

“9·11”事件震撼了美国人民，使他们认识到别人看待他们和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角度可能非常不一样。与平时相比，他们更愿意去重新评估这个世界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为深入地重新思考、重新塑造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而这在“9·11”之前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决定为本书增加一章结论，概括我对全球开放社会的构想。其结构与本书的其余章节不同。它更像一本论战的小册子，而不是一份有关全球资本主义缺陷的深思熟虑的报告；更多地是一种抽象的想象，而非一套切实可行的建议。我打算到时候再进一步详细论述。更重要的是，这个结论还需要经过本书的其余部分已经经历过的批评过程。实际上，它更需要这一过程，因为就它所讨论的主题而言，我所知道的比我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知识要少得多。

对是否把这个结论部分包括进本书里，我曾犹豫难决。因为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 ^{xii} 共识，而这个结论部分可能危及这一目标。尤其是特别提款权建议的实施需要美国的支持，而我的结论对布什

6 索罗斯论全球化

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最终,我决定相信我想动员起来的公众。支持特别提款权的人并不需要同意我所有的观点。如果人民支持,一个民主政府就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即使它不喜欢我的批评。

志 谢

xiii

本书是以互动的方式写成的。我分发了近千册《论全球化(初稿)》，在许多会议上讨论其中的内容，收到了大量的书面评论。基于这些反馈，我修改了报告的内容，写成此书。我愿在此感谢所有贡献了他们的评论和批评意见的人，因为这些评论和意见都极具价值。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出我到底采纳了多少他们的评论，但就我而言，这一过程既有教益又有乐趣。当然，我对最终成果负全部责任。

我要特别感谢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弗雷德·伯格斯特，他组织了一次有高质量的参加者的午餐讨论会。还要特别感谢斯德哥尔摩的奥洛夫·帕尔梅国际中心(Olof Palme International Center)的卡尔·特哈姆，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安排了与乔·斯蒂格勒茨、阿玛蒂亚·森、坎迪多·戈祖波斯基和苏珊·乔治的专题讨论会。中欧大学(Th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与沃尔威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合作在

xiv

8 索罗斯论全球化

布达佩斯举办了三天的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会；而我则获得了在下面这些场合发表我的这些看法的机会：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午餐讨论会，三十国集团的一次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一个休假地，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讨论会，以及世界论坛委员会的最初会议。对外关系委员会安排了一次对特别提款权建议的小范围讨论，参加者包括查尔斯·卡洛默雷斯，莫顿·哈尔帕林，罗伯特·霍梅茨，罗杰·库珀里奇，杰夫·兰珀，凯林·利萨克斯，艾伦·梅尔泽，埃德蒙德·菲尔浦斯，本·斯戴尔，埃德温·杜鲁门，保罗·沃克尔和迈克尔·温斯坦。我还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与我的基金会有关的人举行过许多有关的会议。

我从许多人那里收到过书面的或口头的意见，这其中包括：莫顿·阿伯拉莫维茨，马蒂·阿提萨里，格雷厄姆·阿利森，安德斯·阿斯隆德，拜隆·奥格斯特，特雷斯·巴斯勒，迈克尔·本－埃里，弗雷德·伯格斯特，加格迪什·巴格瓦第，加文·宾汉姆，艾伦·布林德，埃玛·博尼诺，杰克·布尔曼，莱昂·波茨坦，马克·马洛克·布朗，迈克尔·康德苏，托马斯·坎贝尔，杰弗雷·加纳达，威廉·克莱因，罗伯特·康拉德，乔治·柯文，鲍勃·迪康，菲利普·德·S.特瓦伦特，琼·邓洛普，杰西卡·埃因霍恩，叶胡达·

埃尔卡纳, 格雷·埃文斯, 乔纳森·格雷, 约翰·格雷夫· xv
史密斯, 威尔弗雷德·古斯, 莫顿·哈尔帕林, 伊夫林·赫
夫肯斯, 卡拉·希尔斯, 罗伯特·霍梅茨, 戴维·霍威尔, 迈
克尔·伊格纳提夫, 迈克尔·珍德尔泽祖克, 威廉·乔丹,
米盖尔·基古埃尔, 梅尔文·金, 尼尔·金诺克, 霍斯特·科
勒, 查尔斯·考尔勃, 戴维·科腾, 贾斯汀·莱茨, 杰罗米·
莱文森, 阿纳托尔·列文, 马哈穆德·马姆达尼, 保罗·马
丁, 查尔斯·梅恩斯, 弗雷德里科·梅耶, 威廉·麦克多诺,
艾伦·梅尔策, 迈克尔·莫尔, 比尔·莫耶斯, 阿耶赫·纳伊
尔, 安德烈·纽伯格, 西尔维亚·奥斯奇, 吉姆·奥特维, 托
马斯·帕雷, 斯图亚特·帕佩林, 克里斯托弗·帕顿, 莫里
斯·帕斯腾, 杰奎斯·波拉克, 古斯塔夫·拉尼斯, 安东尼·
雷希特, 丹尼·罗德里克, 亚历克斯·朗多斯, 戴维·罗斯
曼, 巴尼·鲁宾, 理查德·拉芬, 安德鲁·撒彻, 格雷·桑普
森, 罗伯特·斯卡拉皮诺, 蒂姆·斯坎伦, 皮尔·肖雷, 克劳
斯·施瓦布, 阿玛蒂亚·森, 贾伊默·萨拉, 克莱尔·肖特,
约翰·西蒙, 基雷尔·索洛科夫, 瓦勒里·索伊弗, 赫伯·斯
特兹, 丹尼尔·塔斯丘斯, 詹姆斯·托宾, 弗兰克·沃格尔,
洛雷·瓦拉赫, 约翰·威廉森, 马贝尔·威斯·斯密特, 詹姆
斯·沃尔芬森, 理查德·瓦特, 和维尔莱特·森泰伊。对那些
未能提到名字的人, 我在此深表歉意。

10 索罗斯论全球化

在特别提款权方面,凯林·利萨克斯是我的顾问和经常请教的专家。冯妮·希尔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打印无数遍各种版本的手稿,她还协调整个项目,核对事实。公共事务出版社的彼德·奥斯纳斯所起的作用也不仅是位出版商,他是这个项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样来自公共事务出版社的保罗·格洛布和罗伯特·金泽伊以非同寻常的高效率完成了出版部分的工作。迈克尔·瓦雄主管联络。罗伯特·布尔斯汀敢于提出批评。与他们一起工作令人愉快。

全球资本主义的缺陷

全球化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可以被赋予很多的意义。就我们在这里进行的讨论而言,我想把它定义成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各国经济日益加强的支配。我认为,大多数被人们与全球化联系起来的问题,包括市场价值对传统上不属于它的领域的渗透,都可以归咎于这些现象。人们当然也可以谈论信息和文化的全球化,电视、互联网和其他交流形式的传播,但恐怕这会使我们离题太远。以这种方式来缩小讨论的范围,我希望我可以把讨论控制在可把握的范围之内,并得出某些可用于制度改进的实际建议。 2

按照我们这儿对全球化的定义,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能使现在与 50 年前或甚至 25 年前区分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国家都对国际资本交易严加控制。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目的,就是要在私人资本流通受限制的环境

12 索罗斯论全球化

里,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① 后来,对资本流动的控制被逐步取消,海外金融市场在 1973 年石油危机的推动下获得迅速发展。1980 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期,国际资本流动获得加速发展;1990 年代初苏联帝国崩溃之后,金融市场才真正实现了全球化。

这并不是国际金融市场第一次发挥如此具有支配性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类似的情况很常见。国际资本流动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被 19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所打断。显然,这一进程并不是不可逆转的。

- 3 全球化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相形之下,人员的流动仍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资本是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必须相互竞争来吸引它,这妨碍了他们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能力。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安排的特点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资本流向他方的能力损害了国家对经济实施控制的能力。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变得不合时宜,因为需要社会保障网的人们不能离开国家,而作为福利国家过去征税对象

^① 重建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欧是世界银行使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终这一任务通过马歇尔计划完成。

的资本却是能离开的。^①

形成这一局面并不是偶然的。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的目标,就是减少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而全球化对实现他们的目标助益很大。

人们并未完全理解自 1980 年代以来的演变的意义。这一演变甚至没有得到一般的认可。^② 资本总是竭力想逃避税收和管制,因此很容易将目前减税和放松管制的倾向理解为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效的经济法则的表现。这实际上至少是英语世界里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我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看法坚持认为,资源的分配由市场机制来决定是最好的,对这种机制的任何干预都会损害经济效率。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标准来判断,全球化进行得非常成功。

确实,从很多方面来说,全球化都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发展。在创造财富方面,私人企业优于国家。而且,国家有滥用权力的倾向。经济全球化给个人带来的自由程度不是单个国家可以做到的。全球范围的自由竞

① 公共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未必减少了,但筹措和支出资金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② 比如,《经济学家有关全球化的调查》(2001 年 9 月 27 日)就否认全球化削弱了国家征税和管制的 ability。

14 索罗斯论全球化

争解放了创造力,发挥了企业家的才干,并使技术创新加速。

但是,全球化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其一,许多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人,受到了全球化的伤害,同时又得不到社会安全网的护持;另外还有许多人被全球市场边缘化。^①其二,全球化导致了私人产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市场长于创造财富,但其目标并非满足社会需要。对利润的恣意追逐会破坏环境,并与其他社会价值冲突。其三,全球金融市场容易遭受危机的打击。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不一定完全了解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也不知道金融危机往往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的打击。其原因我们后面会解释。这

① 对全球化影响进行经济分析后产生的结论有好有坏。世界银行的多勒尔和克雷发现,1980年后贸易在GDP中所占比重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与其“前全球化时期”的增长业绩以及与“非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业绩相比,其增长率更高,而且呈加速趋势。这些国家与发达工业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缩小。他们的研究没有发现贸易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与各国国内不平等情况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绝对贫困的情况在“全球化者”中恶化了。作为争论中的另一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Rodrik)认为,就改善经济增长业绩而言,以国内投资者为目标的国内创新比开放贸易重要得多。David Dollar and Aart Kraay, “Trade, Growth and Poverty”,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 2001年6月。Dani Rodrik,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rade as if Development Really Mattered”, 向联合国发展计划项目提交的论文。哈佛大学, 2001年7月。

全球资本主义的缺陷 15

三个因素加起来会导致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识到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好处，但忽视了他们的缺陷。他们坚信金融市场倾向于走向 6 均衡，并会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即使市场不是完美的，让市场来分配资源仍比通过国家或国际管制来干预其分配要好。

然而，过度依赖市场机制是危险的。市场是用来为自愿参与各方进行货物和服务的自由交换提供便利的，仅靠市场自身不能应付诸如法律和秩序或维持市场机制本身运转之类的集体需要。市场也不能确保社会公正。这些“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治方式来提供。

一般说来，政治方式的效率比市场机制低，但我们不能没有它们。市场是非道德范畴的：它们允许人们按自己的利益行事，并强制实施规定这些利益如何表现的规则，但对这些利益本身不进行道德判断。这正是它们效率较高的原因之一。判定孰是孰非总是困难的，市场将此置于一旁，使人们能无拘无碍地追逐自己的利益。

但如果不对是与非进行某种区分，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政治的任务就是就什么可以被允许、什么应当被 7 禁止做出集体决定——因此政治就须面对在这个缺乏强大的道德规章约束的世界里做出集体决定的困难。

16 索罗斯论全球化

即使是市场的创造和维护也需要有政治行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对这一点有充分的理解。认识得不那么充分的是,在没有相应地强化我们的国际政治和社会安排的情况下,市场全球化导致了非常不平衡的社会发展。

尽管全球化有着种种缺陷,但我仍是其忠实拥护者。我支持它,不仅因为它能生产额外的财富,更因为它能提供自由。我所说的全球开放社会能比任何一个国家确保更大程度的自由。我认为目前的安排,即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社会关注很少得到承认,是全球开放社会的一种扭曲形式。本书的目的是找出这些扭曲,并提出一些实际的步骤来向纠正方向努力。

8

需要在以下几个领域进行制度改革:

1. 抑制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2. 纠正我们现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内在的、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偏向,那些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这一体系。
3. 对有利于创造财富的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补充,创建强有力的致力于其他社会目标的类似国际机构,如减少贫困和在全球范围提供公共物品。
4. 改善那些深受腐败、压迫或无能政府之苦的国

家的公共生活质量。

另一个问题也应得到解决,即市场价值对它们本不应归属其中的领域的渗透。但这仅靠制度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它需要我们价值观的重新定位。例如,医药、法律和新闻等职业都已商业化了。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在本书中,我将集中讨论制度改革。

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并未形成共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倾向于反对前三点,而反全球化激进分子则奇怪地对第四点视而不见。当今世界中痛苦和贫困的主要根源是腐败无能的政府(不利的地理位置是另一个主要原因,但要在这方面做点什么要困难得多)。但反全球化激进分子在他们的倡议中却未对腐败无能的政府所带来的危害给予足够的重视。

全球化并非一个零和游戏。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增长可用于补偿全球化的不平等和其他缺陷,还会有额外的财富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带来的收益超过了成本。这一点很难证明,因为成本和收益不能按共同的标准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一个衡量人类福利的恰当指标。^①不过,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赢家有能力补偿输

^①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18 索罗斯论全球化

家,而且仍能最终领先。问题在于赢家不给输家以补偿。各国国内的政治方式在国际上没有对应的对象。市场已变得全球化,而政治依然牢牢植根于国家主权之中。

在纠正全球化缺陷方面投入的资源极少,结果,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世界上最富裕的 1% 的人的收入相当于最贫困的 57% 的人的收入。有 10 亿以上的人日均收入低于 1 美元;近 10 亿人得不到清洁的水;8.26 亿人营养不良;①每年有 1 000 万人因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而死亡。②这些情况并不一定是由全球化引起的,但全球化在纠正这些问题方面几乎没什么作用。

全球化的不公正招致了广泛的怨恨和抗议。反全球化激进分子试图削弱或摧毁支撑着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各国际机构。我们的国际机构还受到来自相反方向的威胁。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反对对市场机制的任何形式的干预;实际上,他们对国际机构的敌视甚至比他们对政府管制的厌恶还厉害。

①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1).

② *Commission on 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 Investing in Health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cember 2001).

全球资本主义的缺陷 19

极左和极右翼之间无意中的联盟成功地削弱了我们所拥有的很少的几个国际机构。反全球化运动一直在攻击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尤其是世贸组织;而美国国会一直主要的阻挠是联合国,对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的阻挠倒是放在了次要地位。 11

这确实令人遗憾。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而不是更孱弱的国际机构。我们需要组成另一个不同的同盟,其目标是改革和加强我们的国际安排,而不是摧毁它们。本报告之目的,就是要提出一个可据以组织这种新同盟的纲领。

支持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机构相对较强。它们确实需要进行某些改革,因为它们的操作是为控制它们的富国服务的,经常损害处于体系边缘的贫穷国家。但它们比那些服务于其他目标如维护和平、社会和政治发展、健康和劳工条件的改善以及人权的国际机构更有效、更有权力。

联合国是除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外最重要的国际机构,有崇高的目标,但是既没有手段也没有权力来将这些目标变成现实。《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就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其崇高目标,以“我们全体人民”这样的措辞来表达。但是,《联合国宪章》本身建立在成员国主权的基 12

20 索罗斯论全球化

础之上,而主权国的利益不一定与其居民的利益相一致。许多国家都不是民主国家,许多居民甚至不是公民。结果,联合国不可能执行其宪章序言中所阐明的使命。它是个有用的机构,而且可以变得更有用,但如果用其宪章序言来衡量,它肯定让人失望。在依赖联合国时,我们必须时时牢记,它是个国家联盟。正如 17 世纪时黎塞留红衣主教指出、亨利·基辛格最近再次强调的,国家有利益而无原则。^① 因此,各成员国一般都将自己的国家利益置于大家的共同利益之上。这严重地妨碍了联合国的运作。

联合国中最强有力的机构是安理会,因为它能凌驾于成员国的主权之上。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当它们达成一致时,就可以对世界的其他国家强加
13 意愿,尽管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实际上,联合国将两种制度结合在了一个框架中:安理会能凌驾于各成员

① 基辛格引用黎塞留的话说,“国家并不是不朽的,它要么存活,要么灭亡。”基辛格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只会因实力而不会因做得正确而得到好处。见亨利·基辛格著《外交》(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95 年。19 世纪帕麦斯顿公爵在谈到英国的外交政策时说,“我们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1848 年 3 月 1 日在下议院的演讲。John Bartlett, *Familiar Quotations: A Collection of Passages, Phrases, and Proverbs Traced to Their Sourc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Boston, MA: Little, Brown, 1992), 第 397 页。

国的主权之上,而其余国家则处于服从安理会的地位。达成一致同意的需要使其他机构缺乏效力和效率,原因是,联合国大会是个清谈俱乐部,而许多机构都因要满足各成员国的要求而步履维艰。它们还成为多余的外交官和下台政客们的庇护所。^①

前共产主义集团崩溃后,曾经出现过一段本可使安理会按原先设计的那样发挥作用的短暂时期。但是,西方国家并未起而应变。在波斯尼亚危机中,它们未能达成一致;而在卢旺达危机中,它们甚至无所作为。近年来,美国一直未偿付所欠会费,并以其他方式来绕过联合国或贬低联合国的重要性。即使在“9·11”之后,一旦可能,美国仍试图在联合国之外行动。

14

我们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和国际政治机构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全球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市场在创造财富方面成绩斐然。然而,它们并不能满足其他社会需要,如维护和平、维持法律与秩序,以及保护环境、劳工条件或人权——也就是通称的“公共物品”。经济发展,即私人产品的生产优先于社会发展,即公共物品的供应。要纠正这种扭曲现象,只能通

^① 在科菲·安南的领导下,情况已有改善。

22 索罗斯论全球化

过为公共物品的供应作出更好的安排。就此背景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就总体而言，国际贸易、运转良好的市场和财富创造也都是公共物品。反全球化激进分子试图摧毁保障这些公共物品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是误入歧途、大错特错了。那种“压缩或摧毁”世贸组织的做法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这无异于杀鸡取卵。他们不应鼓动反世贸组织，而应努力争取建立与世贸组织一样有效的机构来为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服务。

- 15 世贸组织正在提议进行新一轮将命名为“发展回合”的谈判。与此同时，还应该举行旨在供应公共物品的一轮类似的谈判。这种需要是人所共知的。2000年9月，联合国举行了千禧年首脑峰会，详细阐述了到2015年在减少贫困、疾病控制、改善健康以及普及初级教育等方面的雄心勃勃但可以实现的千禧年发展目标。2002年3月，联合国会在墨西哥的蒙特雷举办一个有关为发展筹资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应集中于在全球范围供应公共物品的问题上。没有这一点，发展肯定还是不平衡的。

世贸组织的任务是促进自愿参与的各方之间的货物和服务的国际交流。通过建立有约束力的规则和一

全球资本主义的缺陷 23

个有效的执行机制,它已完成了这个任务。有两个非常有力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同样的方法不能用于其他公共物品的供应。其一,许多国家本身就缺乏满足国际标准和要求的资源。此外,要找到在贸易领域那种行之有效的强制执行机制,即给予或收回市场准入权,也并非易事。必须有一些经济刺激手段来鼓励自愿遵守国际规则和最佳惯例。收回这种刺激因而也可以作为一种惩罚。在一个国家主权阻碍了用规则约束单个国家的世界里,这可能会很有帮助。 16

世贸组织按规则供应私人物品的体系应由一个按激励方式供应公共物品的体系来补充,这是本书的主要建议之一。

不能把我们目前所有的弊病都归咎于全球化。迄今为止,当今世界中痛苦和贫困的最重要的根源是武装冲突、专制和腐败政府及软弱无力的国家——全球化不应为腐败无能的政府负责。实际上,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提高了效率或者起码是减少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不过,全球化也增加了世界的相互依存性,加剧了由于个别国家国内的问题而对全球经济造成破坏的程度。因此,光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供应公共物品而设计更好的安排是不够的,我们还须找到一些办法,在各个国家

24 索罗斯论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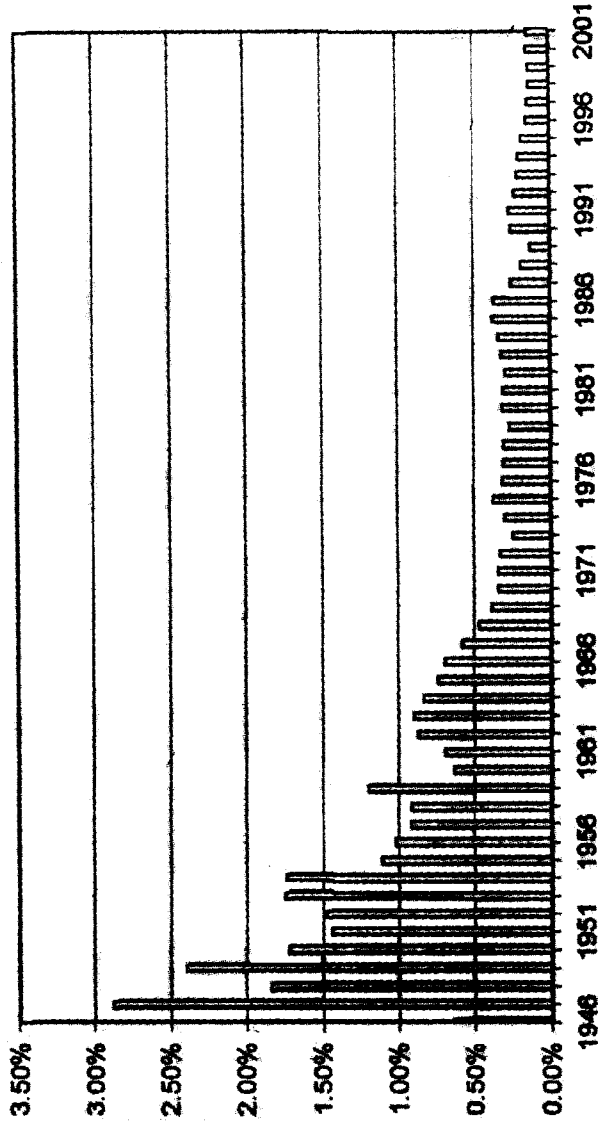
内部进行政治和结构方面的改进。这是本书的第二个主要观点。

“9·11”恐怖袭击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使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多么的相互依赖,而其他国家的国内状况如何对美国的安全又是多么重要。如果不能在阿富汗获得庇护,本·拉登不可能对美国发动攻击。但这一点在“9·11”之前就是正确的。冷战结束后,大多数冲突都是各国内部的事态发展引起的,而不是国家之间关系紧张造成的,这跟冷战时期的情形大不一样。冷战期间,几乎所有内乱都被两个超级大国利用,但同时也受到超级大国的制约。冷战结束后,超级大国施加的限制被解除,国内冲突想要引起外界的干预,就要恶化成流血杀戮。

这是因为外界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惩罚性行动,正面的引导很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带来了长久的好处。在苏联帝国崩溃后并没有类似的措施。对外援助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0.1%,相比之下,马歇尔计划启动之时这一数字是近 3%。对外援助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显示出的并不是一幅美妙的图景(见图 1)。

以正面激励为基础的预防性行动比危机爆发后再

图 1:1946 ~ 2001 年对外援助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变化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局,2001年12月。

26 索罗斯论全球化

- 19 进行干预要好得多。它花费更少,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也少得多。经验表明,防范危机无论何时开始都不算早。早期的干预可能不会引起媒体的关注——正如人们所说的,“没有发生的危机很少被提及”。到紧张局面发展成流血杀戮时,要防止流血冲突的进一步加剧就越发困难。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法治国家,也会受到要求进行报复的压力。不过,在初期阶段难以预测哪一种局势会导致激烈冲突。这一论断能强有力地支持培养我称之为开放社会的社会,在开放社会中,存在处理这些痛苦的机制,痛苦会得到释放。开放社会中也会有冲突,但它们恶化成流血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小。提高政府的质量、在全世界培养开放社会,这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对开放社会的培养不能取代军事力量,但它可以减少不得使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

- 民主和开放社会不能由外部强加,因为主权原则阻碍了外部的干预。对这种社会只能通过加强市民社会,
- 20 并对政府提供激励使之走向经济和政治改革给予促进。

作为本书支柱的两个建议有一个共同点:公共物品的供应和国内状况的改进都需要富国向穷国转让某些资源。这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格格不入,后者认为市场自

身就能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

现有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提供的资源转让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大部分用于对爆发危机的国家进行拯救。世界银行的基本业务是借贷,因而提供赠款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借贷业务盈利状况的限制。世贸组织完全不关心资源转让。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可以发挥比目前更具有建设性的作用(这一点将留待第一、三章和第四章去讨论),但是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国际资金转让形式,它应与现有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的做法大不一样。这是本书的中心论点,将在第二章进一步阐述。

让富国通过国际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转让是非常困难的。由皮尔森委员会确定并得到联合国支持的目²¹标——捐赠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须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0.7%——已有 30 年,但达到或超过这个目标的国家只有五个;^① 2000 年,美国仅贡献了 0.1%,官方发展援助总共仅占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0.24%。这部分差额中美国所占比例最大。

国际资源转让远低于占国内生产总值 0.7% 的目

① 丹麦、挪威、荷兰、瑞典和卢森堡。

28 索罗斯论全球化

标,而美国又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这并不是偶然的现
象。有些人,尤其是美国的有些人坚信,对外援助鲜有
成效,而且有时甚至事与愿违。糟糕的是,这种担忧并
非毫无根据。

我认为自己非常有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本
人就亲自参与了提供大量外援的工作——在过去五年
里每年援助大约 4.25 亿美元——以推动开放社会的建
设。以这个身份进行工作,使我比多数人更清楚地了解
按目前这种方式提供对外援助的种种弊病。根据我自
22 己的亲身经历,我坚信如果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对外
援助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可以大大改观。此外,我并不是
惟一认识到这些弊病的人。许多援助机构,包括世界银
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双边捐赠者以及外界的专家,
都认真地努力对援助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并加以改进,一
种新的模式正在逐渐形成。^① 它着眼于使受援者在项

① 世界银行的《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由拉维·坎伯尔和诺拉·拉斯提领导的一个发展问题专家团队负责撰写,他们对这些问题和有关发现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包含一个相关文献的详尽的参考书目。世行的保罗·科利尔和戴维·多勒尔已经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对这些问题著述甚丰。他们的主要建议在科利尔和多勒尔所著《世界能否使贫困减少一半? 政策改革和有效援助如何满足 DAC 目标》一书中已有概述 (*Can the World Cut Poverty in Half? How Policy Reform and Effective Aid can Meet the DAC Targets*),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1999 年。

目中获得更大的权利和参与感,这些项目被认为会对受援者有益;同时,它也更强调援助的成功率。

我认为,以传统方式进行的对外援助有以下五个主要缺陷:

第一,对外援助为捐助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受援国的利益服务。对外援助的提供常常是基于²³地缘政治的考虑,受捐助国的安全利益驱使。冷战期间对非洲的援助就提供了一些极端恶劣的事例。柏林墙倒塌之后,西德或赠与或借出大量的资金给苏联,全然不顾钱是怎么花的,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德国能获得统一。后来,乌克兰成了西方地缘政治上的“养老金领取者”。由于腐败无能的政府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如果捐助国对它们所支持国家的国内政治状况给予更多的关注,情况会好得多。

第二,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受援国很少拥有发展项目,这些项目由外来者设计并执行。专家撤走后也就所剩无几了。从国外输入而不是在本国培养的项目往往是不能在当地落地生根的。^①各

① 科利尔和多勒尔直截了当地指出,“研究表明,捐助国对政策没有多大的影响力(至少是没有多少正面的影响力)”。*Can the World Cut Poverty in Half?* 第21页。许多对多边援助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条件限制的

30 索罗斯论全球化

24

国喜欢以自己的国民作为分发援助的渠道——这些国民也是支持进行对外援助的选民。甚至国际机构都宁可派遣外国专家,而不在受援国培养本地的人才。专家要对支付他们薪水的机构负责。除了我的基金会和最近才这么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外,没有谁愿意给那些对受援国负责的专家支付薪水。其结果是,受援国常常缺乏消化援助的能力。

第三,外援通常是在政府之间进行的。受援国政府常常俨然成为看门人,可以将资源挪以自用。在某些情况下,援助变成了对本来不得人心的政府的主要支持来源。

第四,捐助国坚持要对自己提供的援助保持控制,因而导致缺乏相互协调。在捐助国竞相向一国提供援助的情况下,受援国政府就可以更容易地将

评估结论都一致表明,改革的本地“拥有程度”越高,成就越大。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为一系列有关条件限制的讨论会起草的报告总结道:“除非接受捐助的政府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作为其自己的政策来接受,除非那些政策能得到该国国内足够广泛的支持,否则那些政策不太可能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实施。”对“过于普遍的条件限制”削弱所有权的担忧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简化、减少其项目中的条件限制。见《国际货币基金支持的项目中的条件限制概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制定与评估部起草,2001年2月20日,第14节。

全球资本主义的缺陷 31

资源挪以自用。波斯尼亚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国际援助被用来养肥当地的诸侯,多半给白白浪费掉了。

最后一点,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国际援助是一项风险极高的事业。积德行善要比办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难得多。这是因为社会福利没有单一的衡量尺 25 度,而利润盈亏是显示在公司财务报表里的。援助是由官僚们管理的,冒这种风险对他们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难怪外援成效欠佳,特别是用其他官僚活动的评判标准来对它进行衡量,且全然不顾它所面临的困难的话。了不起的是,对外援助居然在经济转型国家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如帮助中央银行、金融市场或司法部门正常运作。这表明,尽管外援有着种种缺点,它还是能起非常有价值的作用的。

我的基金会网络的情况有所不同。它的使命是促进开放社会的发展。不管我的基金网有什么其他的长处或短处,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它是为服务受援国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基金由所在国的国民来管理。一个由其本国国民组成的委员会决定支出重点何在。如果能够,它们就与政府合作,如果不能,

32 索罗斯论全球化

它们就独立运作；有时，它们与政府完全处于对立面。当基金会能与政府合作时，它们的工作也会更有效；当
26 不能合作时，它们的工作更会被人需要、受到赞赏，因为它们为市民社会提供了另一个资金来源。一般说来，政府越恶劣，基金会处境越好，因为它会得到市民社会的拥戴和支持。

人们常把开放社会与市民社会混为一谈。但市民社会只是开放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对选民的需要和愿望负责的民主政府，以及一个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府的私营部门的存在也同样重要。当基金会能与政府合作时，它会试图改进政府的能力，使政府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愿意接受这种援助的政府一般会被捐助者控制。但捐助者有自己的目标，而受援国政府在与捐助者打交道时能力有限。某些由基金会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援助旨在增强这种能力，让受援国政府任用自己选用的专家(最好是他们自己的国民)。

除各国的基金会而外，我的基金会网络还包括许多全网络性的项目，涉及各种具体的项目领域，包括诸如教育、媒体、健康、信息、文化、司法制度、中小型企业发
27 展等等。这些项目通过各国基金会来运作，但这些基金会可以决定是否参加这些项目；如果它们参加了项目，

就承担项目的拥有权并对该项目在其国内的执行负责。^① 各国基金会与基金会网络的项目之间的互动产生了一个能将当地需要与专业技能结合起来的母体。这个母体是可调整的。各国基金会有权在网络项目之外运作；在支持市民社会和文化时，它们倾向于这样做。网络项目也可以与各国基金会之外的当地机构合作；这样做时一般是为支持人权和独立的媒体。

对公共事业采取同私营事业一样的方法和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不过，我的基金会网络的方式可以也应该稍加调整后运用到政府出资的国际援助中去。我将在本报告的第二章略述怎样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的建 28
议以用于国际援助的特别提款权为基础，它由富国出资，按照某些规则特别发行。

单靠政府不可能采纳特别提款权建议；反对它的官僚和政治利益集团太多。但民主政府应响应其选民的愿望。这就是需要动员市民社会的原因。时机已经成熟。被称为“千禧年运动”(Jubilee 2000 movement)的由援助的积极支持者和教会团体组成的松散联盟就成功

① 我的基金会资金的 85% 用于受益国。相比之下，国际开发协会 (IDA) 和世界银行借贷的资金在存续期间只有 44% 用在了借款国身上。

34 索罗斯论全球化

地发起了对重债穷国免除债务的行动。^① 西方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都在寻找办法以缓解全球化所造成的问题;^② 联合国 2002 年 3 月的国际发展筹资大会提供了另一个合适的论坛。“9·11”恐怖袭击使美国的公众舆论加深了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认识,使他们更愿意接受新看法,也更具同情心了。如果公众要求这样做,政府应当会采取行动。

遗憾的是,动员市民社会支持某事总比动员其反对
29 某事困难。但特别提款权建议足够具体也足够合理,可以赢得广泛的公众支持。本书其他章节中提出的有关改革现存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的建议就不一定了。这些深奥难懂的事必须由专家来处理。但公众的压力在驱使当局采取行动方面会是有效的。

① 该运动将免除债务的主张比作《圣经》所载的禧年大赦。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宣布 2000 年为禧年。

② 七国集团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20 国集团包括所有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第一章

31

世界贸易组织

经济理论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会使各方都受益。而实际上,其他条件很少有相同的时候。而且,赢家也很少对输家进行补偿。不过,很少有人会质疑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但是,国家可以通过实行限制进口或补贴出口的措施而从中获得额外的好处,而受害方很可能会因此进行报复。如果这种情况不加以制止,自由贸易的好处就很可能损失殆尽。正因如此,制定各方都遵守的通行规则非常重要。而这一点正是世贸组织的成就所在。这使世贸组织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机构。如果世贸组织现在还不存在,人们会不得不将它发明出来。

从许多方面来看,世贸组织是最为先进的和完全成熟的国际机构。它不仅成功地制定了国际法,而且还成 32
功地行使了司法机构的职能。此外,它还找到了强制执行裁决的办法。世贸组织使用的办法是:除非受害国获

36 索罗斯论全球化

得赔偿或者造成伤害的做法已经停止,不然,世贸组织就授权遭到伤害的国家实行报复。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在其他多数领域,国家主权对国际法的执行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特点是:拥有全球金融市场,但是各种政治安排却稳固地植根于国家主权之中。

由于世贸组织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我一直十分敬佩世贸组织,尽管我原来对它的实际了解不算太多。实际上,世贸组织的内部运作程序如此之复杂,以至于过去每逢讨论该组织的时候,我就两眼发直。不过,最近世贸组织遭到了由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组成的联盟的联手攻击,这迫使我要对世贸组织看个究竟。我发现世贸组织批评者们的一些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个机制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世贸组织的任务是实现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自由化,它非常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实际上,如果考虑到世贸组织的形成需要创始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这一事实的话,必须承认它是一个
33 有着律师般精明的杰作。但是,批评者们的这一指责是对的:世贸组织的安排偏向有利于富国和跨国公司。这种偏向的存在不是由于世贸组织的机制,而是由于这一机制使用的方式,以及由于缺乏同样有效的服务于其他

社会目标如社会正义、保护环境或者保护人权的机构。
我将一一考察这两种缺陷。

谈到有关世贸组织机制的滥用,有两个问题就会突出显现。第一,从最重要的产品的贸易量角度来看,存在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品的不公平问题。逐步解除农产品、纺织品和鞋类的关税和非关税限制的时间要比解除对较先进的工业产品限制的时间长得多。发达工业国目前每年花3 600亿美元来补贴它们的农业。^① 相形之下,它们在对外援助上的花费仅 537 亿美元。^② 美国也继续保留反倾销法带来的好处,它可援引此法来防止低成本的进口。这些特点制造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竞争环境。^③

第二个问题与照顾公司利益的偏向有关。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TRIMs),但却没有除监狱劳工以外的与贸易有

① 1999 年数据,见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2001*,表 3。

② 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 2000 年的净官方发展援助(ODA)是 537 亿美元。见 www.oecd.org。

③ 布什政府正在与各国会议员做交易以换取他们投票支持快车道谈判授权。这些交易对发展回合谈判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比如,布什政府答应拒绝本已许诺给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纺织品进口方面的让步。

38 索罗斯论全球化

关的劳工权利协议,也没有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协议。对象的选择明显有利于公司利益。事实上,正是推行“多边投资协议”的努力触发了反全球化积极分子的第一次抗议,并使他们在阻止该协议方面取得了第一次成功。

世贸组织的规则禁止各国由于生产方法的不同而对实际相同的产品实行不同的待遇。^① 这一规则的目的是防止各国通过推行与生产方法有关的管制规定来歧视外国供应商,但实际上这使得各国难以强制推行环境、劳工或人权标准。当然,这些标准可以通过国际条约硬性规定,但是条约很难缔结,更难执行。例如,国际劳工组织(ILO)制定了一套完备的公约,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而且,如果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要得

35 到遵守,就会与世贸组织的规则发生冲突。如,劳工组织曾批准成员国就强迫劳工(与监狱劳工有区别)问题对缅甸实行制裁,可是,为作出响应而愿意对进口的缅甸产品实行限制的劳工组织成员国却会因此而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如果一国国内的规定被认为对其他国家的

产品构成了歧视,世贸组织的规则就优先于国内规

① 监狱劳工生产的产品除外,它被认为是非法的。

定。^① 缺乏国际管制规定以及国内管制规定受阻共同导致了有利于公司利益的局面。

在其他领域如人权、劳工环境、健康和环境保护缺乏同样有约束力的管制规定的情况下,世贸组织使国际贸易凌驾于其他社会目标之上。^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贸组织过于成功了。它实际上是惟一个美国愿意服从的国际机构。这使它非常强大。但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只能创造财富;而社会还需要其他公共物品才能存在和繁荣。在当今的世界里,私人利润和公共福利之间存在着不平衡,这就是世贸组织遭到攻击的一个首要原因。

其他国际机构的弱点不可能通过改变世贸组织来克服。除那些与国际贸易有关的问题外,世贸组织也无力处理其他的环境保护、食物安全、人权和劳工权利问题。尽管可以也应该进行一些变革,使世贸组织增加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但是,主要的补救办法在于各国,尤其

① 其管制规定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或采纳了这类规定的国家可能受到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制裁。

② 在有关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的序言中——和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一样——确立了一系列它迄今为止未能实现的高尚的目标。世贸组织的宪章声明,“贸易的进行应着眼于”确保充分就业和收入的不断提高,同时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保持一致。

40 索罗斯论全球化

是美国,对其他国际协议给予同等的支持。

世贸组织的长处在于它的执行机制。强制执行的办法对提供公共物品是不合适的,原因有二。其一,成员国是不会忍受这种做法的。世贸组织找到了一种主权国家愿意接受的极佳办法,因为它们想得到贸易的好处。但这是个例外;各国不能接受在其他领域也实行这种办法。不征得各国政府的一致同意,世贸组织的规则是不能修改的,也不能增加新的规则。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能想像它会同意包括人权和劳工权利吗?美国现政府在水环境问题上会变得愿意听从大家的意见吗?

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国家确实缺乏满足国际标准要求的资源。不应对它们强加要求,相反,向穷国提供资源,使它们有能力自愿遵守这些要求,这种办法要好得多。

以童工问题为例。我们不应在世贸组织里出台禁止童工的规定,而是应当为普及初级教育提供资源。然后,作为接受这种资助的一个条件,我们就可以要求接受国在一段时间内废除使用童工的做法。在巴西有一个被称为 Bolsa - Escola 的成功的探索性计划,它对贫困家庭提供补贴,如果他们所有的孩子都正常上学的话。现在提出的另外一个计划将对女孩提供一个存款账户,

如果她们能念完八年级的话。如果有国际援助,这种计划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这种办法能克服国家主权造成的障碍,因为是否接受资助,是由国家自愿做出的决定。

再以全球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造成的社会混乱为例。^① 它们带来了补偿、再培训和社会安全网的 38 需要。这些是世贸组织所确立的国际贸易规则之外的国内任务。但某些国家过于贫穷,无力筹措采取必要措施所需的资金;它们需要国际援助。这正是我们的全球制度安排中所缺少的。必须建立一个以自愿遵纪守法为基础的公共物品供应制度,用以补充世贸组织以规则为基础的私人物品生产制度。我打算在下一章提出建立这种制度的建议。

除新的援助架构之外,贸易的架构也需要进行某些改变。有许多突出的问题:劳工权利;环境保护;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协议(TRIP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竞争政策,反腐败政策,税收政策;以及世贸组织的组织安排。其中一些问题已包括在发展回合

^① 创造性破坏是约瑟夫·熊彼特用来描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进步的术语。见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1942)。

42 索罗斯论全球化

的谈判中；其余的则需要以其他的方式来处理。

39

劳 工 权 利

不平等地对待劳力和资本,是以目前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资本会流向那些劳动力便宜以及有其他有利条件的国家。这有助于那些国家的发展,其中许多国家已取得了众人瞩目的进步。发达国家会损失工作机会,但贸易带来的收益会创造新的、常常是高附加值的工作。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向富国的合法和非法移民,以填补当地无法填补的工作职位空缺。但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中的工人往往被剥夺组织工会的权利,并在其他方面受到虐待。

劳工权利并未包括在发展回合谈判的工作计划中,未来诸回合的谈判中也不太可能再包括进去。这正符合跨国公司的公司利益。

有一个国际机构是以保护劳工为己任的,这就是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先于世贸组织成立,它在一个方面较世贸组织具有优越性:它有由政府、工会和雇主组成的三方结构。除此之外,其宪章与世贸组织的宪章
40 章几无二致。它精心制定了所有必要的公约来保护劳

工。和世贸组织一样,国际劳工组织也授权其成员对拒绝遵守其调查委员会——很像世贸组织的仲裁委员会——发表的报告的另一成员采取经济性的制裁措施。世贸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成员国许诺承担的义务。比如,美国政府只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182项公约中的13项,以及8项核心劳工标准中的2项。

鼓吹更好地保护劳工权利的世贸组织的批评者找错了目标。他们应当鼓吹加强国际劳工组织而不是反对世贸组织。世贸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之间应当实现更好的平衡。如果成员国有政治意愿,它们就会批准和执行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的官僚机构也需振作。它安于缺乏权威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尽力而为,收集信息,并从其微薄的预算中拨款支持小规模抗议活动。最近它超越了习惯的角色,成立了有关缅甸强迫劳工的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严厉的报告,但什么作用也没有。最近⁴¹的一个后续报告也反映没有任何改善。

由于世贸组织如此强大,而国际劳工组织又被证明是如此的无能为力,某些全球化的批评者希望使世贸组织在执行劳工标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种方式

44 索罗斯论全球化

也有问题。许多对劳工权利的侵犯与国际贸易无关,可能也没什么影响,比如,用童工生产国内的谷物或禁止公共汽车司机组织工会。此外,世贸组织可能也不愿对那些不是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签字国的国家进行制裁。正确的做法是批准和执行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这正是市民社会应发挥作用、对政府施加压力来促使它们这样做的地方。

有人认为,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可以在世贸组织中挑战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委员会授权的行动。如果有哪个国家对缅甸实施贸易制裁,就会发生这种情况。遗憾的是,这种看法从未得到过验证,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按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结论行事。我相信世贸组织的仲裁委员会将认可国际劳工组织的裁决;否则,人们就有正当的理由起而反对世贸组织。

42 国际劳工组织是一个无害的机构,甚至中国也不介意与它签署合作与谅解协议。这在未来某个时候可能会有用,当国际劳工组织变得更为强有力时,可以对中国施加压力使其尊重结社的权利。中国有着几乎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其劳工的生产率也在提高。除非中国允许其劳工分享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否则其他国家将越来越难以与中国竞争。

环境、健康与安全

环境、健康和安全管制带来了某些棘手的问题。按照现在的情况,各国可以任意实行它们想在国内实行的管制,但如果进口产品与其本国生产的产品没有什么实质区别,没有哪个国家能以贸易制裁来将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另外一个国家。这一规则惟一的例外是,如果存在世贸组织成员国双方都签署了的有效的国际协议,可遵循协议的规定。这使对其他国家强加环境标准变得很困难。正如全球变暖问题的谈判所揭示的,要达成国际协议是很困难的。

43

在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中,美国颁布了一条管制规定,禁止进口以某种方法捕获的虾,这种方法不能保护濒危物种海龟。这一规定在世贸组织受到了挑战。经过漫长的诉讼,2001年6月,一个仲裁委员会裁定支持美国禁止进口虾的决定,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注意到了美国诚心诚意的谈判达成海龟保护条约的努力。对环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胜利,同时这也消除了抱怨世贸组织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确立了一个可以在其他环保案例中可以援用的先例。

46 索罗斯论全球化

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显然,在一国受到其他国家的生产方式的影响的情况下,比如在全球变暖引发的问题影响下,它应能通过实施贸易制裁来保护自己。但如果在一国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如印度皮革鞣制造成的空气毒害或智利的铜冶炼造成的土壤污染,怎么办?如果美国禁止本国国内对北极的开发,它能禁止进口俄罗斯的产自北极的石油吗?

诚然,世贸组织不适于处理环境、健康和食品问题。

- 44 在这些领域,世贸组织既缺乏权威,又缺乏技能。这些问题都很复杂,而且高度敏感。世贸组织卷入,只是为防止它们被用来达到保护主义的目的。在世贸组织以外来处理这些问题要好得多。

发达国家的环保积极分子叫嚷着要求实行统一的环境标准,但穷国无力负担这些标准。以强制执行机制来实施标准显然对欠发达国家构成了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应使用财政激励来保证自愿遵守。保护环境是一个高尚的目标,相信这一点的人必须准备为此付出。在动植物保护方面已经有许多私人的倡议;在涉及全球性关注的问题如雨林或濒危物种时,公共财政支持可能是合理的。

在环境问题上没有普遍性协议。有人提出应有类

似世界环境组织之类的机构,但对国际机构的反感很强,这种呼吁不太可能得到响应。实际上,建立一个正式的官僚机构并不合适,尤其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机构;但是,建立一个依靠专家小组而不是由资助方指定的官僚的虚体机构,也并不算过分。这样的—个机构可⁴⁵以靠它的专业技能获得权威,并对全球环境政策产生影响。

在布什政府主张建立的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加入劳工、环境和人权等考虑因素,比对世贸组织进行翻新改造要容易得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的规定最近所作的更改,使坚持国家环境标准变得比过去容易了。这说明民众的情绪已开始影响官方对贸易政策的态度。^①但劳工组织对此仍满心疑虑,理由也很充分: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言,劳工方面的附加协议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本身的主要内容并无法律关联;因此,违反附加协议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没有什么影响。相比之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 11 章即有关投资的一章,则有有效的条款来对公司财产权进行保护。

^① “NAFTA Deal Changed to Curb Companies,” *Financial Times* (U. S. ed.), August 3, 2001, page 3.

48 索罗斯论全球化

46

知 识 产 权

知识产权既涉及概念问题,也提出了实际的问题。“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这个术语本身就是误导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从有形财产进行错误类推的基础上的。^①有形财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是其价值来自于拥有者对它的使用,而知识产权的价值来源于其他人对它的使用——作家希望别人阅读他的作品,发明家希望自己的发明得到人们使用。专利权和著作权是为了确保创作人得到奖赏。但是,金钱并不一定是他们寻求的惟一奖赏。譬如,按传统来说纯科学属于公共范畴,科学家想要的是对他们的聪明才智的肯定,而不是经济上的报酬。知识产权将智力活动变成了商业活动,而商业当然是以牟利为动机的。可以说,这方面走得太远了。就鼓励对研究的投资而言,专利保护当然是需要的,但当科学、文化和艺术被牟利动机支配时,有些东西也就丧失了。

要理解目前的情况,我们就得回到农业的圈地运动

^① John Kay, "Intellectual Rights and Wrongs," *Financial Times* (U. S. ed.), March 21, 2001, page 17.

时期。在英格兰,当资本主义降生时,公有的牧场变成 47
了私有财产以提高其生产率。一个不幸的事实是,个人
不能从公共财产的改进中获得足够的利益来证明他们
在改进上面所做投资的正确性。这就是所谓“公地的悲
剧”。科学和文化传统上基本属于公共领域,现在也面
临着一场类似的圈地运动。公共领域的私有化对文化
多样性、实际上对文化本身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很难想
象,如果不允许免费搭车者接触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文
化自身怎样繁衍传播。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世贸组织
的解决能力。要想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创造一
种更好的平衡,需要改变思想,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

由于与治疗传染病尤其是治疗非洲的艾滋病所需
的药物有关的问题,知识产权的相关问题受到众人关
注。面对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制药公司已经开始让步
了,美国也作出了一个重大让步,允许将这一问题包括
在发展回合的谈判议程中。这是一件大好事。问题是,
下一步制药公司可能会将资源改向,投向不那么敏感、
因而也更有利可图的领域。现在花在研制、开发化妆品 48
上的资金,也远远超过用于医治热带疾病的资金。^① 需

① 据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的统计,1975年至1997年间投放市场的1223种新药中,只有13种是用于治疗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通常要面对的热带疾病的。

50 索罗斯论全球化

要建立新激励机制来促进为欠发达国家服务的药品的研究和生产。盖茨基金会走的是一条正道,它对为防治传染病而研制发明的疫苗和其他药物及疗法提供资金奖励。

世贸组织一旦卷入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问题,它就打开了一个潘朵拉的盒子。如果知识产权可以是适合让世贸组织来处理的问题,劳工权利或人权为什么不可以呢?专利和版权保护的需要是存在的,但这种保护确实构成了对贸易的限制。多大的限制是合适的呢?技术先进的从创新中获益的国家与欠发达的需为此付费的国家有着非常不同的盘算。知识产权在美国的谈判议程中地位很高,而欠发达国家则有理由抱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的规定。这个问题需要比在发展回合中所考虑的更彻底的重新思考。

保护投资与反腐败措施

另外一个引起争执的主要领域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是为了在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之间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乍看起来,这是个崇高的目标。然而现实情况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

世界里,竞争场所是向国际投资者和跨国公司严重倾斜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会使这种倾斜制度化,并进一步加强。

各国常给跨国公司减免税收的优惠和其他补贴,因为它们必须竞相吸引外国投资。而在自然资源开发方面,让步则常常是通过贿赂得来的。采矿和石油公司一旦获得让步,就急忙打击腐败行为。但在为抢得让步而争斗时,反腐败的斗争就偃旗息鼓了。^① 世贸组织没花力气去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是为防止对跨国公司出现歧视而设计的。这些规则来自乌拉圭回合谈判,针对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实施的国内成分和出口业绩的要求。^②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越来越50多地在地地区性贸易安排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中使用很高的国内原产地成分要求、地区性激励以及歧视性的反倾销规定,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规则对此不能制约。这种不平衡必须在下一回合的贸易谈判中得到纠正。世贸组织的规则中没有一条反对跨国公司在其从事业务的国家进行有害于该国的活动。

① 这是以与采矿公司的高级经理的讨论为基础得出的。

②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导致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52 索罗斯论全球化

很难找到修补世贸组织的结构以使它能处理贿赂问题的方法。这并未使这一问题变得不那么紧迫。补救办法存在于其他地方,但需努力地寻求。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25年前,美国已宣告美国公司贿赂外国政府的行为为非法,最近,经合组织就反腐败法典达成了一致意见。还需要些额外的措施。比如,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强制要求石油和自然资源公司披露它们向各国支付的费用,不管是公司内或公司外,如果它们的股票想在美国上市交易的话。这使所付的所有费用加总成为可能,从而使接受的政府为此负责。一个名为全球目击者(Global Witness)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呼吁采取类似的措施,这值得支持。

鼓励国内成长起来中小企业(SMEs)的发展是应该的。但是,目前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没有认可这种重要性。贸易规则应为支持中小企业提供空间。同样,鼓励措施最好在世贸组织的范围以外实行,可采取向中小企业提供小型贷款和更优惠的资金的形式。这是下一章要讨论的缺少的要素的一部分。

竞争政策和税收政策

贸易惠及各方的结论是建立在均衡理论的基础之

上的。但是,均衡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经济发展属动态。自由市场是趋向均衡发展的,但只有收益递减规律起作用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如果存在技术革新和垄断市场的情况,增加投资可能会带来收益递增。在这种情况下,尽力使投资额超出理论上的均衡是合算的。而且,各国必须竞相吸引资本。这些考虑表明,存 52
在确定规则以禁止在全球一级的反竞争行为的需要。

竞争政策和税收政策实际上已列入发展回合下一阶段的谈判。根据不管你把什么东西扔进锅里总能煮出某种东西的逻辑,这么做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由于主要的谈判各方所持看法大相径庭,很难看出谈判的结果究竟如何。对资本征税和制止跨国公司满足其垄断的渴望,无疑是我们当代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中的两项。

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了一个财政事务专家组成的顾问小组来起草联合国 2002 年 3 月在墨西哥举行的发展筹资峰会报告。小组主席是墨西哥前总统恩内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这个小组所提出的建议中包括成立一个国际税务组织(International Tax Organization)。这个设想可能过于雄心勃勃了——人们对建立新组织的做法普遍地强烈反感。经合组织在税收领域一直十

54 索罗斯论全球化

分活跃,提出了一些谨慎的合作建议。布什政府起初抵
53 制,但在“9·11”之后改变了立场。在控制避税天堂方面
的进展也许是反恐战争的有益的副作用。

组 织 安 排 问 题

尽管我并未发现世贸组织的结构有多少不妥之处,但批评其结构的运作方式还是有理由的。由于缺乏透明度、只照顾跨国公司的利益和不关心欠发达国家的利益,世贸组织备受批评。这些过错可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该组织的运作方式。世贸组织的工作班子不大,预算也微不足道。^①这与前几代国际机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反映了我们当今反对成立机构的偏向。这种安排固然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

世贸组织简直就没有人力或预算来保持足够的沟通或者保护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在其他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里,有工作人员详细阐述问题,而且发达国家的代表团为欠发达国家提供庇护;在世贸组织里,所有谈判都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欠发达国家往往无力保护自

^① 西雅图会议之后,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穆尔指出,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的年预算(2000年时为3.5亿美元)比世贸组织的高三倍。

己的利益。它们在设计乌拉圭回合的条款时没有太多发言权。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一个国家必须作为一揽子交易参加所有经谈判达成的协定,因此它们只能全盘接受乌拉圭回合的所有条款。尽管这可能是完成乌拉圭回合所必需的,但这导致许多国家抱怨说不知道都签署了些什么东西。某些国家因而难以履行其义务。

如何才能纠正这种情况呢?显然,必须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以使它们更有效地参与世贸组织的谈判和决策。既然我不太了解世贸组织内错综复杂的情况,我就提一下英国的《关于国际发展问题的白皮书》^①和受联合国秘书长之托编写的《塞迪略报告》。这些文件建 55
议提供法律援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了解现有的贸易规则,提供技术援助以培养较贫困的世贸组织成员的贸易谈判能力,制定更为灵活的世贸组织规定截止期,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给予更细致的特别和差异待遇,并对谈判进程进行可能的改革。令人鼓舞的是,2001年11月,启动发展回合谈判的多哈部长级会议宣言中承诺进行重大的努力来实施这些建议。英国政府已为

① “Eliminating World Poverty: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for the Poor.”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年12月由英国国际发展事务大臣奉女王之命提交英国议会)。网址见:www.globalization.gov.uk

56 索罗斯论全球化

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总之,如果辅以一套自愿遵守国际规则和标准的资金激励体制,发展回合谈判在医治全球化带来的弊病方面可能会有帮助。下一章将提出一种提供这一缺失的要素的方法。

第二章

56

国际援助：缺少的要素

57

国际金融结构所缺少的要素，是一种帮助、鼓励和加强自愿遵守国际标准与要求的行之有效的提供援助的方法。这种安排不仅必须包括资金来源，而且还需有更有效的资金发放办法。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成绩令人非常不满，所以很难得到资金。对外援助的名声属美国最差。那些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更大部分用于援助的国家也得展示更好的成绩。

需要援助是因为要实现各种各样的目标。我们可以先列出两大类目标：在全球规模上提供公共物品，以及促进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 58

第一类目标包括环境、教育和卫生问题。例如，防治传染病的斗争就不仅仅局限于一些特定的国家。

第二类目标首先指的是提倡政府正直清廉，其中不仅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提高效率，廉洁奉公，司法机构必须独立可靠，而且还包括实行法治并在公共领域

58 索罗斯论全球化

和私人领域之间建立适当的关系,即建立一个不受国家支配的社会,不同政府官商勾结的私营部门和能发挥作用的市民社会。合适的方法必定因国情不同而异,西方民主并非惟一可行的模式。不过,还是有一些自由和人权方面的普遍性原则,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照顾少数和尊重少数的意见的原则——这些原则都需要予以尊重。为了强调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模式,我是把开放社会作为目标来谈的。

开放社会可被视为民主的一种非常广义的表述,其中还包括了经济进步和减少贫困。它与受到国际间认同的减贫目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了各国实行的政治安排的重要性。联合国作为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组织,过去不得不回避这个问题。但是,导致贫困的最主要原因是腐败无能的政府。应当承认,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是十分困难的,但正视这个问题仍是重要的。

可以也应该通过强制执行国际法来实现一些目标。拓展和加强国际法还有很大余地——《京都议定书》或它的经改进的版本、《禁止地雷条约》或者《管制小型武器贸易条约》都非常必要;国际刑事法院也应当建立。但是,国际条约是很难缔结的,执行起来就更加困难了。目前美国的态度是主要障碍。

国际援助：缺少的要素 59

通过经济制裁来强制执行作用有限,而且很容易变得事与愿违。贸易禁运常常被打破,那些走私者往往与制裁措施要惩罚的政府沆瀣一气。其真正的结果是惩罚了该国的人民,却为政府的生存提供了经济支持。制裁在伊拉克和南斯拉夫所起的作用正是如此。像美国对古巴所实行的那样的单边制裁甚至更加无效。近来有向所谓聪明制裁发展的趋势:针对与政府有关的人实行旅行限制和采取金融方面的措施。这些措施成功的可能性大些。 60

提供正面的激励以鼓励自愿守约——简言之,就是提供对外援助——是最可能获得成功的方法。这对伊拉克和前南斯拉夫这样的冥顽不化的国家可能不起作用,但能鼓励那些真正对改善社会状况感兴趣的政府,并使它们具有这样的能力。如果碰上压迫性政府,对外援助就应仅通过非政府渠道进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在向那些无力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这些国家包括人们过去所称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即前共产党国家和较不发达国家,还包括作为封闭型经济发展、尚未做出调整以适应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如亚洲和拉美的很多国家以及几乎所有非洲国家。它

60 索罗斯论全球化

61 们加在一起占了世界人口的大多数。

许多机构需进行结构性调整,从司法机构到保健、教育和经济的许多领域,从银行业到农业和能源业。虽然国与国之间情况各异,但是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有一种采取一刀切做法的倾向,而这种做法大都由国际金融机构和受援国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大多数援助采取的是向政府提供贷款的形式,再加上一点技术援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机构所起的作用有少许不同:世界银行有一支很大的队伍,往往更直接参与各领域贷款的设计和落实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雇员较少,主要集中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依靠受援国政府来执行意向书中明确规定的计划。如果政府不能遵守规定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停止付款。

62 由于国际金融机构控制着资金,因此在支持哪一种经济改革和以什么条件提供支持的问题上,它们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国际金融机构对经济改革形成了一个基本上是标准化的做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教义,而世界银行则提供标准的菜单供受援国选择。

这种做法带来的结果好坏不一。世界银行对在 10 个非洲国家执行的方案进行了评估,其中两个国家获得

成功，两个完全失败，其他的处于两者之间。^①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形也大抵如此。

委托给国际金融机构来完成的最宏大的工程，是协助前苏联帝国解体后成立的各个国家实现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这方面的成绩与众人的预期相距甚远。一些前苏联卫星国勉强实现了过渡，而俄罗斯直到最近才开始显示出经济复苏和市场改革初具规模的迹象。

在我看来，这项工作本来绝不该交由国际金融机构来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是让借款的政府签署意向书，如果政府不能遵守规定的条件，它就停止付款。^②当政府垮台时，它们也不可能履行其意向，而在 63
大多数前共产党国家都发生了政府垮台事件。需要一种更具有介入性的、不同的做法，那时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将会受到苏联和其后诞生的国家的欢迎。对西方来说正确的政策是提供援助，就像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在战后西欧所起的作用。但这个想法甚至没人考虑过。

① *Aid and Reform in Africa: Lessons from Ten Case Studies*, edited by Shan-tayanan Devarajan, David Dollar, and Torgny Holmgren (Washington, D. C.: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April 2000).

② 这些条件在谅解备忘录中正式化。

62 索罗斯论全球化

1989年当我在波茨坦的东—西方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时,简直是当场引起哄堂大笑,撒切尔政府的副外相带头。^①西方民主国家不愿意承担这一责任,更不愿自己掏腰包。这就是它们把这个任务委托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这个委托后,我建议它采取更有的放矢、更具有介入性的方式来提供支持。^②我的建议是,10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援助计划款项应指
64 定专用于养老金、失业救济,其发放应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组织和监督。给俄国政府保持收支平衡和资助预算的同一笔钱本来也可以用于建立社会保障网。但如果按前一种办法,这笔钱就不会掉进政府的腰包而变得无影无踪,而是得以在俄罗斯人民当中广为分配,使他们明显感到国际援助的实惠。这个方案本来还可以通过刺激消费者需求来鼓励产业改造,并为那些在这种重组中失业的人提供某种社会保障。

既然我的这个方案甚至连被考虑的机会都没有,我

① 按《法兰克福汇报》的说法,我的建议让人们“觉得可笑”。

② George Soros, “A Cold-cash Winter Proposal for Russ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1, 1992, page A10.

国际援助：缺少的要素 63

便着手证明自己主张的可行性。我用 1 亿美元建立了国际科学基金会,并根据非常透明的择优标准为大约 3.5 万名科学家发放了不到 2 000 万美元款项。这些科学家实际上每人获得了 500 美元,这些钱足够他们维持一年的生活。^① 这可能是人们惟一一次获得有形的帮助,他们及其整个社会从未忘记过。这种小规模活动的结果表明,如果大规模进行此类活动会取得何种结果。试想一下,如果所有养老金领取者都能领到养老金,如果所有失业者都能得到失业津贴,那么历史的进程就不一样了。想一想马歇尔计划在战后欧洲的巨大作用,它不仅促进了经济重建,还使亲善结成的纽带长存。而像现在的情况,历史性机会已经丧失,前苏联各国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而一种贪婪、暴虐的商业文化却站稳了脚跟。^②

国际社会在巴尔干半岛所做的也强不到哪儿去。在波斯尼亚已经花了数十亿美元,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捐助国之间缺乏协调,而且大多数援助都是通过

① 这是个极度通货膨胀的时期。

②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过渡经济国家,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程度都增加了。见《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0 年),表 1.2。

64 索罗斯论全球化

政府渠道来进行的。^① 这么多援助者争相冲向同一个入口,看门人也就能将资金挪作自用了。

我们应当可以从这些失败中获得经验教训。人们
66 已经对国际援助的缺陷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新的模式正在诞生。人们已经认识到,各国应自己掌管自己的发展项目,在筹备这些项目时政府也必须与其公民商量。世界银行已率先进行了全面发展框架(CDF)的尝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与世行一起,要求《减少贫困战略文件》(PRSP)应包括重债穷国(HIPC)的优惠贷款和免除债务。这些倡议都仍在萌芽期,但它们显示出了希望,值得受到鼓励。^②

虽然我支持诞生中的新模式,但我相信还有其他的教训应汲取。其中之一就是国际金融机构不适于用来应对政府腐败无能的问题。按照其宪章,它们必须通过政府渠道行事。这使它们官僚化,而官僚总是倾向于规避风险。签署意向书的好处之一是,假如意向未能落实,不会怪罪到基金组织的头上。而在政府渠道之外行

① 我建议设立一个基金,与世界银行合作来为中小企业提供资助,但波斯尼亚政府坚持要获得该基金的控制权。世界银行不得不听从波斯尼亚政府的要求,但我不听,结果这项基金也就从没建立起来过。

② 我用这个在官方圈子里常用的缩写来表示该项事业的官僚性质。

事的责任要大得多。官僚机构厌恶担风险是有其道理的——各式各样的多管闲事者会对它们妄加评论。国家官僚机构就更是众矢之的了，因为它们的主人多如繁星。不管美国国会还是欧洲议会都表现出一种对外援管得过细的倾向。近年来，美国国会已发展到对诸如联合国和国际金融机构这样的多边机构的活动都要事必躬亲的地步。⁶⁷

进行系统性的变革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这种风险甚至比私营企业的还要高，而且也不存在单一的成败判断标准。社会变迁是非线性的反射性过程，在一个时间段里正确的政策，在下一个时间段可能就不再适当了。这意味着无法事先预知结果。系统性变革风险性很大，有成功的机会，但也有失败的可能，就像金融市场的行为一样无法确定。^①

国际金融机构可以起重要作用。当与它们能帮助的有意改革的政府打交道时，它们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新的范式能帮助国际金融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但通过政府以外的渠道来进行援助有非常迫切的需要。

① William Easterly,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Economist'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 (Boston: MIT Press, 2001) 对国际援助的缺陷和其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做了有见地的阐述。

66 索罗斯论全球化

某些职能只有政府才能完成,而对外援助的最佳用途之一就是改善政府的能力。但政府并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行为主体;如果国际援助帮助政府扩大在经济中的作用,那它就有问题了。

苏联体制崩溃时,西方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持来使政府完成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因此,没有转型,只有崩溃。惨痛的教训使我们发现,一个封闭社会的崩溃并不会自动导致一个开放社会的诞生,一个运转不良的国家对自由和繁荣的威胁和压迫性政府的威胁可能同样大。^①

由于同样的原因,向压迫性或腐败政府提供的国际援助可能会帮助巩固这些政府的统治。在某些情况下,外援成了这些政府主要的支持来源。如果援助在地缘政治考虑的指导下进行,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在冷战时期这种情况时常出现,随着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很可能再次出现。

在缺少有改革意愿的政府时,利用非政府渠道尤其重要。这时,通过提供针对专横和低效率的政府的宝贵的制衡力量,国际援助可以促进开放社会的形成。但即

^① Stephen Holmes, "What Russia Teaches Us Now: How Weak States Threaten Freedom," *The American Prospect* (July ~ August 1997), 30 - 39.

使是存在有改革意愿的政府,对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的支持仍是至关重要的。民主政府应当鼓励对非政府渠道的利用。

可以看出国际援助是非常复杂的。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我们应当采取的是有创新性的而不是官僚式的方法。但社会创新比赚钱更为困难,这是我从个人的经历中得出的经验。对赚钱来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成功与否的标准:盈亏线。账目中包括的各种各样的项目都为单一的一个目的服务:利润。在为公共利益服务时,情况就颠倒过来了。一项社会事业的后果会体现在许多不同的标准而不是单一的标准下,这许多不同的标准并不能简单地加总。国民生产总值常常被当作一种替代性的评价标准,但这可能会非常误导,因为不同的人会受到不同的影响,而且还会有许多意料之外的后果。按企业经营所使用的标准来衡量,国际援助必然会被认为是低效的。对外援助在美国的声誉之所以如此之差,原因之一就是使用了错误的衡量标准。

社会创新应能在国际援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它不应取代政府间的项目,而应成为政府间项目的补充。⁷⁰人们已提出许多成功的社会倡议,但缺乏足够的资源去实行。按经合组织的统计,国际援助所能获得的资金量

68 索罗斯论全球化

远远不足,且自 1990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2001 年 11 月,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呼吁世界各富裕国家将对外援助每年另外增加 500 亿美元,但此后在渥太华举行的会议上,他的建议似乎根本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虑。为动员额外的资源,必须让公众确信这些资金会得到良好的使用。这就需要解释对外援助内在的困难,并找到更好的办法对它进行管理。

托 宾 税

人们已经提出了几种具有创新性的对外援助筹资方法,但除非有公共舆论的呼吁,否则没有哪一种方法会被采用。其中一个较受欢迎的建议是由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教授提出的,即对金融交易⁷¹ 收税。确实应该对金融交易征税,不过其理由应与托宾教授提出的观点有一些不同。“托宾税”到底能否减少货币市场的波动,从而实现它声称要实现的目标,现在还不完全清楚。

诚然,“托宾税”会减少货币投机活动,但同时也会减少市场的流动资金。这样一来,像收购大公司这样的大宗交易就会对汇率造成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

通过更频繁地动用官方外汇储备来抵消，譬如公司大笔交易所用的货币可由官方储备提供，不过这就涉及对货币市场的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而且并没有证据证明有关当局愿意承担额外的负担。

征收托宾型税种的理由有多种。金融市场全球化使金融资本获得了一个相对于其他税源的不公平优势；对金融交易课税会纠正这种不平衡。为什么应该有增值税(VAT)，而不应有金融交易税呢？按照这种理由，就应将金融交易税推广到所有金融市场，而不仅仅是货币市场。征收这种税在执行方面会有严重的问题，但都是可以解决的。对金融衍生工具与合成产品怎样征税呢？这看起来像是个棘手的问题，但实际上很容易解决。有一个指标，德尔塔系数(Delta)^①，可用附属证券⁷²来表示金融衍生工具的价值，因此可在交易时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德尔塔系数价位征税。但是，与征税相联的问题更为严重。收税必须在全世界进行，包括那些逃税庇护所(tax havens)。但如何加以执行呢？只好让收税国从收入中提成。但该提成多少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可

① 德尔塔系数是对应于附属证券价值变化的期权价值的变化。比如，当现货价格是122日元时，一份预购价格为125日元的一月期的100万美元/日元买入期权，等同于181.1万美元/日元。

70 索罗斯论全球化

以成为不征收金融交易税的借口。即使解决了这些问题,也还存在如何有效使用这些钱的问题。

正如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已经表明的,组织人们反对某些事总比让他们支持某些事容易。为了动员公共舆论来支持增加国际援助,有关的建议就不仅要表明如何筹资,还要说明如何花费。

73

特别提款权建议

我有这样一个建议:发行由富国捐赠的专门指定用于提供国际援助的特别提款权。这项倡议几乎可以立即带来很大一笔钱,用以资助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公共物品,并促进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而且,这项倡议可为无限地获得大笔源源不断且可靠的发展资金流指明道路。^①

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其成员发行的国际储备资产,可以兑换成其他货币。欠发达国家可以把其特别提款权加入自己的货币储备;较富裕的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交易计划”的定义)将根据某些规则来捐赠它们的额度。欠发达国家可以从其货币

^① 见第 76~77 页专栏对特别提款权的阐述。

储备的增加直接获益，并从全球范围的公共物品供应中
间接获益。

人们普遍认为，用于国际援助的资金量需大大增加。为蒙特雷发展筹资问题会议准备的《塞迪略报告》
估计，实现 2015 年的发展目标每年可能还要追加 500
亿美元，切实满足对公共物品的需要又要花 200 亿美 74
元。^①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呼吁每年增加 500 亿美
元。

用特别提款权进行国际援助的建议可分两个阶段
实施。在第一阶段，美国国会应批准发行 214.3 亿的特别
提款权专款（大约相当于 270 亿美元），1997 年国际基
金组织已批准这笔款项的发行，但目前仍在等待美国国
会的批准。但有一项前提，即富有的成员国要按照某些
规则来捐赠自己的额度。由于即使根据 1997 年决定修
订的方式富有的国家仍须承担大多数特别提款权配额，
因此至少可以立即得到 180 亿美元用于国际援助。^②这

① 联合国秘书长的发展筹资高级小组报告，前墨西哥总统恩内斯
托·塞迪略任主席。网址为：www.un.org/esa/ffd/a55-1000

② 假定目前“交易计划”中包括的所有 38 个成员都能贡献其额度。
见 *Financing IMF Transactions, Quarterly Report*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June 1, 2001 – August 31, 2001)。

由于额度分配方案的制定方式，在特别提款权专款的分配中会出现

72 索罗斯论全球化

将是对这一想法的一次实际检验。如果成功,最初的特别提款权发行就可以由定期的每年发行的特别提款权额度取代,而其数量也可以增加。显然,这里建议的方案对实现大家同意的发展目标会有很大帮助。

利用特别提款权来为国际援助筹资不仅能增加国际援助所获资金的总量,还能确保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公平地贡献一定的份额,因为基于配额的特别提款权额度与成员国的经济力量大致相当。任何一种集体性的事业都会碰到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如果努力成功,整个团体都受益,但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因不做贡献而获益。用特别提款权机制可以防止免费搭车问题。最重要的是,这里提出的方案能矫正对外援助的许多缺陷,尤其是目前政府援助机构管理所带来的弊端。不管特别提款权机制是否得到采用,这些好处都应得到保留。

76 对特别提款权的说明

根据约定条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权发行特

某些不正常的情况。比如,英国所承担的额度会很小。因此,需要有某种安排来确保英国贡献其应承担的公平的额度。这些不正常情况在定期的特别提款权分配的情况下会消失,因为后者以各国的特别提款权份额为基础,这能大致反映出各国经济力量的相对强弱状况。

国际援助：缺少的要素 73

别提款权。1969 年创立的特别提款权是国际储备资产，可作为计账单位，也可以作为支付手段在基金组织各成员国间、基金组织本身和指定的“其他持有人”之间使用。其他持有人的资格必须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 85% 多数的同意。特别提款权是一个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的一部分。许多国际机构和发展银行用特别提款权作为计账单位。成员国和指定持有人可以为外汇储备买卖特别提款权；借进、借出或抵押特别提款权；利用特别提款权进行掉期和远期交易；用它们进行金融债务结算；并用特别提款权进行或接受捐赠。

特别提款权的价值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这四种主要货币的一揽子组合决定。2002 年 1 月 1 日，其价值为 1 特别提款权 = 1.25673 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可以用特别提款权按当前汇价向其他成员购买货币，这种汇价是每天都进行调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协助特别提款权的“其他持有人”安排货币的购买。

特别提款权是有利息的金融工具。成员国可获得所持有的特别提款权的利息，并为其所欠特别提款权额度支付利息。特别提款权的利率（由提取

74 索罗斯论全球化

77

其原有额度向其他成员购买货币的成员支付,并由通过这类交易特别提款权持有量增加的成员获得) 是 以其货币是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组成部分的国家(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代表性短期债务的加权平均值为基础的,每星期进行调整。2002 年 1 月 1 日,特别提款权的利率是 2.23%。利息按季度支付。

特别提款权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分配和分发的过程创造出来的。最近的一次分配是在 1981 年进行的,使特别提款权的总额度达到了 214 亿。特别提款权的额度必须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投票权的成员 85% 的“绝对多数”同意,它是按各成员国的股份配额来分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取消特别提款权,但没有这样做。

1997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成员国同意修改该组织的条款,以使一次特别的“公平”特别提款权分配获得通过,它使前苏联各国及其他转型国家以及较贫困的成员 国获得的额度超过了按标准的以配额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应得的数量。

对约定条款的修改也需要 85% 的多数通过才能得到批准。到 2001 年 12 月,第四修正案已获得

国际援助：缺少的要素 75

72.7%的投票权支持。需要占总投票权 17.13% 的美国的批准来使它超过 85% 这一界限。这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同意。对这一修正案的批准会马上带来 214.33 亿的新额度,使余额总数翻倍,并大大增加转型国家和较贫困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尽管在修改后的格局中,富裕国家仍将获得大约 2/3 的总额度。

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各国对国际援助的贡献非常不均衡;美国远远落在后面,仅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⁷⁸用于对外援助。我们所建议的特别发行的数量大致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0.1%,其后发行规模可以扩大。由于特别提款权捐赠的本意是作为目前对外援助水平的补充,因此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应能保证更大规模的国际援助,并能更为公平地分摊成本。更重要的是,改变用以分配援助的机制。这种发展筹资新办法还应伴之以新的资金管理办法。我提议建立某种让各个方案通过相互竞争来获得捐助国资金的市场。下面就谈谈这一市场如何运作。

按照建议中的计划,成立一个在国际货币基金领导之下但运作独立于该组织的国际委员会,由它来决定哪

76 索罗斯论全球化

些项目有资格接受特别提款权捐助。^① 委员会的成员委任名人来担任,有固定任期,且不接受其政府的直接指令。安排一个独立的审计委员会来进行独立的监督和评估。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将提出一个战略,但它无权
79 决定资金的使用。它只准备一个候选项目名录,捐赠国可以自由地从中选择,创造一个捐赠者与项目、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市场式互动。委员会保证项目的质量,而捐赠国选择的质量则要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

人们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即国际委员会由名人而不是由通常的由政府任命的人组成,这些名人的选择以公开表现出的专业资质为基础。联合国所支持的反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信托基金正在组建中,所有的主要捐赠国都想在委员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委员会的规模好不容易才减至 18 名;还有 7 个委员席位要保留给西方七国。由于联合国秘书长是为各成员国服务的,他难以对它们施加压力;而一个由名人组成的委员会所处的位置就好得多。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约定条款要求基金组织及其成员国以外的特别提款权持有人必须是“指定的”,即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 85% 多数的批准。其他持有人必须是“官方实体”。我们这儿的建议是执行委员会应将决定接受特别提款权捐赠资格的责任委托给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尽管技术上它仍将保留法定权力。

候选名录将包括全球规模的提供公共物品的信托基金,并使这些基金与各种社会倡议对应。第一批特别 80
提款权发行时,有资格列入名录的项目应限于三到四个特定的优先领域如公共健康、教育、信息(数字鸿沟)和司法改革。^① 政府支持的减少贫困项目不包括在内;它们将由国际金融机构负责。这将有助于使这一检验更为成功。具体的项目领域可以由次一级委员会来处理,其成员应具有必需的专业资格。这样也能更好地区分责任,机构间发生冲突的机会也会减少。就公共健康而言,如果捐赠国同意这里所提出的选择办法,新成立的对付传染性疾病的信托基金可以成为次一级委员会。

如果特别提款权的第一批发行成功,特别提款权可以每年都发行,那么合格的项目的范围也可以扩大。政府所支持的减少贫困项目也可以申请,但应限制在某种程度,以给非政府渠道留出资金。到那时,目前国际金 81
融机构(全面发展框架和减少贫困战略文件)正在建立

① 我建议将司法改革包括进去,因为国际金融机构是不允许向法官和政府雇员额外支付工资的。这往往是司法改革和反腐败项目的绊脚石。比如,格鲁吉亚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它想通过许诺体面的薪水来任命通过竞争性的考试挑选出的称职的法官,但后来未能兑现其承诺,世界银行支持的改革努力也失败了。而这个方案中的合格项目不会有这种缺陷。

78 索罗斯论全球化

的新范式也已经具体化了。但政府所支持的项目所获得的特别提款权数量应受到某种限制,否则它们可能会吸纳所有可获得的资金。政府都偏爱政府间的渠道。重要的是其他倡议的资金不能被耗尽,因为正如我前面已经强调过的,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① 我将举几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哪些是有资格获得支持的项目。

1997年,我的基金会参与了在俄罗斯监狱治疗肺结核的项目。我们的目标是改善监狱的条件,我们试图通过治疗那些既感染犯人也感染监狱看守的疾病来争取监狱当局的合作。我们应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即DOTS——短程直接观察治疗法——我们认为,1500万美元的援助足以产生重大影响。不久我们发现,大量的犯人感染了一种有多重抗药性细菌感染的肺结核(MDR-TB)。由于DOTS治疗法对

82 MDR-TB不起作用,坚持用DOTS可能实际上反而会增加MDR-TB的发生。MDR-TB是一种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的全球性威胁——1990年代早期,为控制这种在纽约市的莱克岛和其他地区发生的传染病花费了约10

^① 参见 Easterly,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113。

国际援助:缺少的要素 79

亿美元。显然,我们在俄罗斯碰到了远远超过我们的资金能力的问题,当时每治疗一名 MDR - TB 病人需花费 1.5 万美元。我们动员了该领域内最好的专家,并委托波士顿的健康伙伴研究所 (Partners in Health) 进行 MDR - TB 的全球性影响的研究。取得的成果之一是将治疗这种疾病的成本减至一名病人仅需 300 美元。下一步,我们就要求健康伙伴研究所制订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对付肺结核的运作计划。它们与 STOP - TB 组织合作提出了“全球防治肺结核计划”,STOP - TB 组织是由 190 个合作组织共同组建的合作组织,其中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22 个直接受到影响的国家的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代表。2001 年 10 月,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公布了这个计划。它要求五年内花费 93 亿美元:48 亿美元来自受影响的和捐赠国的国家预算,资金缺口仍达 45 亿美元。这一缺口可以由特别提款权捐赠来填补。“全球防治肺结核计划”也有助于为新成立的联合国资助的反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指明方向。⁸³

在建立捐赠者和项目之间市场式的互动方面,我的基金会网络加入了“社会投资全球交流”计划,它将在 2002 年 2 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提出。贝恩及

80 索罗斯论全球化

同仁公司无偿地充任主要的顾问。它们制订了一个认证程序,指定经授权的中介来提交它们愿为之承担道义或管理责任的项目名单。公司捐赠者、基金会和想进行慈善捐助的个人将应邀从名单中选择项目。这实际上是私营部门对我所提出的特别提款权捐赠建议的检验。如果成功的话,社会投资全球交流计划可以包括在名单中,有资格获得相应的来自特别提款权捐赠的支持。

小额贷款是社会创新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能发挥作用。困难之处在于如何扩大其规模。成功的小额贷款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但它们无法靠自有收益或通过金融市场筹资来成长。

84 将小额贷款转变成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就需要找到吸引额外资本的方法。这将需要对该行业的一般性支持,也需要对单个企业的资本支持。行业支持不仅包括开发管理软件,并使之像公共物品一样可获得,还要训练管理人员,建立评级机构以及贷款担保机制。评级机构将有助于吸引想进行慈善性投资的股本投资者,他们愿意接受低于市场收益率或完全没有收益的情况。而贷款担保机制将使合格的小额贷款机构能发行商业票据(世界银行的可赎回式资本也可用于担保,使

这些票据获得 AAA 级信用)。^①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用于教育目的的资助,这种资助可采取巴西的 Bolsa - Escola 方案的方式,它对较贫困的家庭提供补贴,只要其子女定期上学。将教育资助和保健以及小额贷款结合起来,就能使很大一部分人群摆脱贫困。

当地区或国家捐赠者进行协商时,特别提款权捐赠机制可能会特别有用。巴尔干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⁸⁵人们对采取协调一致的地区性方案的需要已大致达成共识。这导致了东南欧稳定条约的签署。但这一条约仍是一个空壳,因为捐助者仍保留对其所承诺捐助份额的控制,并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而如果稳定条约被指定为特别提款权捐赠的潜在接受方,那么所谓条约工作表所收集和批准的各项目可能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资助,国际援助也可能会更为成功。

阿富汗是另一个恰当的例子。如果捐助国保留对其捐助的支出的控制权,那失败就几乎是注定的。需要有更有效的协调方法。援助应在社团的基础上进行,应

^① 最近孟加拉国的格拉明银行(Grameen Bank)出现的问题也说明了建立一个评级机构的重要性,见《华尔街日报》2001年11月27日第1页的报道。

82 索罗斯论全球化

当有一个起领导作用的机构,而不是让一大堆援助机构无序地忙来忙去。就阿富汗的情况而言,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就很合适。阿富汗内战期间,它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在当地的阿富汗雇员加在一起有数千之众,如果在流亡海外的阿富汗人中招聘,这一数字还可以迅速增加。将钱包的控制权交给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样的国际机构可以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地方军阀将会固守自己⁸⁶的势力范围,而不会像以前一样去争夺喀布尔的控制权。当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掌管资金的人员必须得到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保护,而新组建的政府无法反对,因为这是获得重建援助的惟一可行办法。经过一段巩固时期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以撤出,一个新的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将接管已经建设完成的地方基础设施。^①当然,没有特别提款权,所有这些也能实现,但特别提款权方案如果可行,将会加快捐助资源的聚合和共同管理。

有充足的理由将特别提款权的年度配额与捐助方案区分开来。由于全球化,国际贸易比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快大约两倍。为避免国际收支平衡出现问题,

^① Soros, "Assembling Afghanistan,"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3, 2001, page A21.

各国必须保持一个稳健的外汇储备与进口的比率。一般认为外汇储备的最低限度绝对不能低于相当于三个月的进口值。因此，贫困国家需将其出口收益中的一部分留作外汇储备。特别提款权的额度可以减轻这种负担。由于1997年到1999年新兴市场的危机，出现了资本自新兴市场逆向流出的情况，这种负担因而也变得更重了。⁸⁷

特别提款权额度对发达国家没什么用，因为其货币储备是充足的——对欧元区国家来说甚至有富余^①——而且，如果它们的收支出现赤字，总能借到钱。这就是支持发行特别提款权的共识如此难以形成的原因。但如果发达国家通过捐助特别提款权而发现它有用，对发行特别提款权的支持将大大加强。

各中央银行传统上反对特别提款权额度，是因为这种额度侵犯了它们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它们念出的符咒是特别提款权会刺激通货膨胀。但从短期来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小。实际上，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进口品成本的稳步下降可能导致全球性的通货紧缩。正如日本的情况所表明的，对付通货紧缩没有什么现成

^① 2001年10月时，欧洲中央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总额达3 930亿欧元。

84 索罗斯论全球化

的好药方。每年发行的特别提款权实际上大部分会用于国际援助,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有用的货币工具。

88

法 律 考 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约定条款已规定要定期发行特别提款权,并明确规定可以捐赠特别提款权。有关将特别提款权与援助联系起来的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包括 1980 年代的债务危机时期。1986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部长级顾问机构临时委员会拒绝了这种联系,它声称:“本委员会强调特别提款权的货币性,因此它不应成为一种转移资源的手段,本委员会建议执行委员会对特别提款权的货币性质可能的改善进行研究,从而增强它作为货币储备一个组成部分的吸引力和用途。”^①但在 1997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按特殊的分配方案进行一次性的分配,使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能获得更大的份额,而这打破了它在 1986 年所强调的原则。这一决定的意图显然是转移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货币储备。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6 年年度报告》(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6 年),第 111 页。

在最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强调根据其条款“特别提款权只能在发现有长期性需要或根据第四条修正案的基础上分配，这要通过一次性的特殊分配来进行”。作为对我的建议的回应，它承认⁸⁹ “无法阻止各国根据自己的理由自愿地将特别提款权转让给其他国家或指定持有人……索罗斯建议的构成与从前一些建议类似，它们都主张通过半独立的信托基金对特别提款权进行分配后的再分配”。^①由于存在通过发行特别提款权来补充储备的长期性需要，这种发行要独立于捐助方案，我的建议显然符合法律要求。捐助方案使发行特别提款权的理由更加充足。是否用特别提款权来进行国际援助因而显然是一个政治决定。我相信时机已经成熟。

特别提款权是否应被视为预算内项目是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应该和不应该都有其理由。原则上说，特别提款权的配额只是记账的项目，但特别提款权一旦捐赠，就成了事实上的支出。这是将它包括在预算中的理由。而特别提款权的配额只用于加强货币储备——就

^① “SDR Allocation in the Eighth Basic Period – Basic Consideration,” IMF Staff Report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ovember 16, 2001), box 3, page 13.

86 索罗斯论全球化

美国而言,是外汇稳定基金。如果提出和支出的数额相
90 同,除对应于基金的利息债务而外,货币储备不受影响。
各中央银行或美国的财政部通常并不寻求获得拨款来
应付其包括获得的或损失的利息在内的外汇储备的变
化——这是不将特别提款权捐赠包括在预算中的理由。
通过预算制定过程来进行特别提款权捐赠可能带来困
难,尤其是在欧盟国家,它们本来就反对马斯特里赫特
条约和稳定条约的限制。完全避开预算制定过程会招
致货币当局的激烈反对,它们这样做也是有理由的,因
为这将破坏预算纪律。

根据其条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取消也可以创
立特别提款权。人们可以认为,只有在特别提款权可以
收回的情况下,它的捐赠才应通过预算制定过程来进
行,因为只有到那时捐赠对中央银行的收支平衡表才会
产生影响。对美国来说,只有那时才会对外汇稳定基金
产生影响。最终,要由每个国家来决定怎样处理其特别
提款权的捐赠。美国可能会决定在进行捐赠时将它包
括在预算中或不将它包括在其中。欧盟国家可能用它
们过剩的货币储备服务于这一目的。

91

这一建议的优点

特别提款权建议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为贫困国家提

供帮助：间接方式是通过捐赠，直接方式是通过增加其货币储备。增加的部分不必承担利息，因为只要它们持有其特别提款权配额，利息的收入和支出就将相互抵消。这已经是最接近免费午餐的形式了，只要你不把它吃了，它就是免费的。特别提款权方案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这使它更具效率，但也更难以解释清楚。

特别提款权捐赠是对双边援助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捐赠将自愿地存入一个由第三方保管的账户中，如果没有分配出去，利息就将存在这个账户中，捐赠国不能从中得到好处。这将确保捐赠实际上的支出。本书所提出的方案将防止捐赠国用其特别提款权配额来资助自己的双边援助计划。

创立新的国际机构会遇到广泛的反对，尤其是在美国。这类机构被认为是官僚的、浪费的——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些机构冗员繁多、运作成本高昂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成员国坚持保持控制并把这些机构当作 92 政治酬报工具。我所建议的方案能避免这一缺点。它相当于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但特点与现有的那些非常不同。由于法律的因素，它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下运作，但实际上独立于该组织。其日常管理成本可能极低。这一方案的运转更像一个有组织的市场：捐助国

88 索罗斯论全球化

和方案之间会出现公开的互动,类似于供求之间的关系互动。无论方案的执行情况,还是特别提款权的分配,都要接受公开监督。我在痛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险之后,现在竟然倡导在外援项目中搞一种市场经济,这似乎显得自相矛盾。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市场作为一种反馈机制的优点。

对外援助“市场”若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认识到它的效率一定没有正常的市场那么高,这一点很重要。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并没有一个单一的与企业的盈亏线类似的成功标准。确实有某些目标如死亡率或文盲率可以用数量指标来衡量,但如果将目标仅局限于有数量指标的那些目标上,那就是有缺陷的也是误导性的。社会
93 事业方面的成功较难实现,更难以衡量。如果这一看法能得到承认,那么失败就更容易得到宽容,而成功也就更受重视。这将使社会创新事业的实施更容易,吸引更多的人才。

在导言中,我指出了五个使对外援助劳而无功的因素。我认为,我在下面建议的安排能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

- 第一,捐助国利用外援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会被大大减少。各种自我认定的国家利益当然仍

会对外援项目的选择产生很大影响,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 第二,外援项目市场会使捐助国和项目主管人获得一种拥有感和责任感。
- 第三,政府间交易所带来的束缚会被一举粉碎。信托基金的一大好处是,它们不需经过政府渠道加以提供。^① 这样一来,政府就再也不能充当看 94 门人了,压迫性政府和腐败无能的政府就因此而失去了盗用资金的许可证。许多捐助国争着挤进一个受援国政府入口的现象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许多项目争相获得捐助国的资助。看

① 这些信托基金能大大增加现有国际机构的作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起特别宝贵的作用。和世界银行一样,开发计划署结构相当庞大,在所有较不发达国家当地都派驻了代表,但是它的正式预算要少得多,使用方面也受到严格限制。信托基金可以给它较大的回旋余地。开发计划署仍需获得所在国政府的批准,但信托基金可将注意力集中在立志改革的政府身上,加强它们吸收外援的能力。在那些没有立志改革的政府的国家,信托基金也能成为向社区团体直接提供资源的渠道。在政权发生革命性变化时,这一特点尤其宝贵——它可以消除常常阻碍获得成功的瓶颈。例如,开发计划署同我的基金会结成了伙伴,正在携手为从国外返回的符合资格的南斯拉夫公民提供生活补贴。在许多国家里,有必要向符合资格的法官付至少是临时性的工资补贴,以反对贪赃枉法。但是现在找不到资金。世界银行有一条禁止向公务员付工资的规定。而开发计划署具有满足这个需要的能力。

90 索罗斯论全球化

门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 第四，捐助国之间的协调会得到加强，因为援助方案要经过委员会批准才能获得特别提款权捐款。由于每一个国家都按其配额出资，免费搭车的问题将会消失。
- 第五，希望对外援助本身所固有的风险能被更好地认识，项目制定得更像风险投资，而不像官僚机构搞出来的东西。即使抱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意愿，成功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还一定要取决于时机的把握、具体的结构细节或完全凭运气。项目市场并不能保证资源的最佳分配，但是它可以通过提供迅速、可靠的反馈来利用市场的主要优势。

我的乐观预期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之上的。我在此概述的各项原则业已在我的基金网络付诸实践（尽管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楚明了地加以阐述）。我在许多国家的基金会实际上已经发挥了信托基金的作用，它们的款项都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拨给，它们的结果大都与这里所阐述的预期一致——一些很成功，一些不那么成功。但是，成绩远大于缺点，而且缺点很快就被

发现并克服。总的来说，我深信结果相当好，足以构成大规模实施的理由。应当承认，公共企业不能完全仿效私营企业，但是却可以从私营企业的榜样中得到裨益。

特别提款权建议可能会被定于 2002 年 3 月在墨西哥蒙特雷市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大会采纳，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下一次会议上实施。它不会取代塞迪略报告中所论及的其他资金来源。那些来源也应当考虑，但我相信这一建议在许多方面都更为优越。征税方面没有问题，法律框架已经铺好，而且这一方案可以通过一次性的拨款来检验，这只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就能生效。它的主要缺点是复杂，难以理解。它所服务的目标不止一个，专家在将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货币工具来使用方面的看法也肯定会泾渭分明。但只要有更多、更好的国际援助的政治意愿，就有办法克服所有的反对。在 9·11 之后的氛围下，随着 2002 年 3 月的蒙特雷会议和 6 月有关非洲问题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召开，政治意愿的积聚是可能的。

特别提款权捐赠方案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全球化的弊端。我所提议的特别提款权使用机制也不能避免国际援助所有的问题，它只能提供一个更好的机会来使这

92 索罗斯论全球化

种援助更加有效。在一个不完善但愿意改进的社会里，人们所能期待的也就是这些了。

第三章

97

结构性改革：多边发展银行

世界银行是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姐妹机构建立的,其原来的使命是在私人资本很少或无法获得的时代为那些基础设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的国家提供长期资金。它逐渐地将关注点转向欠发达国家(LDCs)。地区发展银行都是以世界银行为样板建立起来的。

世界银行的资本金主要通过工业化国家提供担保金的形式获得,这些担保金使世界银行可以在资本市场上按 AAA 级的信用等级进行借贷。这种在几乎不给富国带来任何代价的前提下施与穷国好处的做法,确实是金融方面的明智之举。实际上,这些担保金从来都没有动用过。

但是,这种安排有一大弊端:它把世行贷款困在政府间机构的紧身衣里。世界银行的章程要求其贷款必须得到借款国政府的担保,而这些担保则成了申请获得贷款的国家政府手中控制的工具。借出的贷款常起到

94 索罗斯论全球化

巩固腐败政权或压迫性政权的作用。主宰世行执委会的发达国家政府对世行的放款活动也能施加同样坏的影响力。它们可以大力主张提供那些有利于自己出口工业的贷款,也可以否决那些会造成竞争或者以其他方式损害它们利益的贷款。

1960年,增设了一个提供优惠贷款的机构——国际开发协会(IDA)。其目的是向世界银行中最穷的成员国提供利息非常低、偿还期很长的贷款。^①接着,世行也建立了一个附属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FC),它可在私营部门进行投资,也可以借款给私营部门。此外,世行还建立了一个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它同
99 样也是专为私营部门而设的。

原来,世界银行主要从事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但随着其工作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已逐渐使自己转向着重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的创造及减少贫困方面。在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的领导下,世界银行的这一转变变得更加明确。他引入了“全面发展框架”的

^① 目前,国际开发协会所提供的贷款中约有60%的资金来自于捐款,其余大部分来自资金重新流入和世行的贷款所得。开发协会的年放贷额是很可观的,每年平均达60—70亿美元,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而且只占世行通过非优惠窗口借出的贷款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观念。接着,对重债穷国的债务减免带来了“减少贫困战略文件”,这是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共同推动的进程。新的国际援助模式正在形成。在新的模式中,受援国可以获得更大的拥有感;那些取得进展的受援国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援助,那些未能实现目标的受援国会受到惩罚。国际金融机构显然试图从它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幸的是,反全球化的积极分子和其他批评者不愿给它们吸取教训的机会。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人们对这一模式的进程该如何运作还很不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地位也很不清楚。国际金融机构必须获得时间来使这种新模式具体化。

詹姆斯·沃尔芬森上任后,世行主动开展了多种急需的社会性活动,从小额贷款到远程教育,到防治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它已开始试验向低于国家一级的机构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贷款,但借款的范围却受到了 100 世行章程的限制,因为章程规定这种贷款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给与赠款、直接同中央政府之外的社会方面(如私营部门、地方政府和社区团体)打交道,更有成效地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世界银行的借贷业务受到了其章程的约束;在提供直接赠款和技术援助方面,它的资金很有限,因为这些资金主要来自放贷业务所获

96 索罗斯论全球化

得的利润。国际开发协会的发展赠款机构 (Development Grant Facility) 只有 1 亿美元。依我之见, 世界银行可自由支配开支的活动比它的贷款活动带来的好处更多, 副作用也较少。

布什政府最近提出世界银行应该减少贷款, 增加赠款活动。它主张国际开发协会一半的资金以赠款形式发放。

表面上看, 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 由于布什总统的建议并没有提出要增加资金, 因此其实际影响反而会全面减少世界银行的活动。这正好与《梅
101 尔泽报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于 1998 年 11 月设立的, 为未来美国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提供建议。

在其 2000 年 3 月发表的最终报告中, 梅尔泽委员会批评世界银行是人员过于臃肿的官僚机构, 还指责它从事本来可以由资本市场来解决的放贷活动。^① 报告建议世界银行退出作为其主要业务的贷款活动, 将担保金归还工业化国家, 将自己重组为向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援助的世界开发机构 (World Development A-

① 国际金融机构顾问委员会(梅尔泽委员会)报告, 2000 年 3 月。网址为: www.house.gov/jec/imf/ifiac.htm

gency)。梅尔泽委员会对获得援助的资格作了十分严格的界定：人均收入超过 4000 美元的国家将被排除在外；从人均收入 2500 美元起，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将受到限制。可通知赎回的资本将根据贷款额度的降低而相应减少；金融公司将并入新成立的世界开发机构，并将 53 亿美元归还给股东；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应被解散。这种做法简直是要将巨额资金从世界银行转到富国手中。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梅尔泽委员会主张增加对最贫困国家的赠款，条件是“赠款得到有效的使用”。但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在制订详细计划时赠款的增加会陷入僵局，从而使现有的活动规模实际上缩减。 102

我同意《梅尔泽报告》中的一条建议：世界银行的使命和运作方式应重新加以考虑。世界银行的放款业务效率低下，已经不再合适，在一些方面还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它加强了接受贷款国中央政府的作用。但是，我不能同意像梅尔泽委员会建议的那样对拟议中的世界开发机构的作用横加限制。在按梅尔泽的标准应排除的巴西这种国家里，贫困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这些国家还深受资金借贷费用高昂之苦。同跨国公司相比，地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因而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把资金归还富有国家还是取消世界银行的可通知赎回资本，都是毫无道理的。相反，世界银行的

98 索罗斯论全球化

可通知赎回资本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与梅尔泽委员会的建议相反,终止世界银行现有的
103 放款义务为时尚早。像巴西甚至智利这种所谓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分配是极不平均的,而且社会需求很多。资本市场对政府开支是相当难以容忍的,对周边国家债台高筑也是绝不能容忍的。世界银行正好可以填补这种重要的空缺。

世界银行的贷款业务确实需要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消除无意造成的不良影响。世界银行应更多关心借债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实际上,世界银行正开始这么做。全面发展框架注重与市民社会的协商。增加透明度和反腐败在世界银行的工作重点中位居前列。尽管世界银行在没有受援国政府担保的情况下不能向其放款,但是,世界银行仍须实行大力监督,以确保贷款根据实际需要发放,而不为政治因素所左右。世界银行应拒绝向压制性政权和腐败无能的政府提供贷款。美国法律中所内含的标准非常好,其他成员应当仿效。^①

① 根据国际金融机构法案第 701 条款,要指令国际金融机构中的美国执行董事反对向这样的政府提供任何贷款或援助,如果该政府“持续地粗暴违反国际公认的人权,比如酷刑或残酷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对待或惩罚,不经指控长期关押,其他对人的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明目张胆的否认”。在“援助的具体方向是服务于这类国家公民的基本人道需求时”,该要求可被免除。

结构改革：多边发展银行 99

贷款业务的一大好处是，它确实能使世界银行得到一些可供其自行支配的收入。如把世界银行改为世界 104 开发机构，就会增加世界银行对捐助国政府的依赖性，使它不得不面对各双边援助机构现在所遇到的种种不利。因此，应当减少而不是增加世界银行的管理对捐助国政府的依赖程度。国际援助的一大祸根是，捐助国的利益凌驾在受援国政府的利益之上。

要减少世界银行对政府股东的依赖程度，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应根据个人能力和专业资格定期任命，且应更加独立于任命他们的各国政府——就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的情况一样。此外，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不得力图施加影响，以使自己本国的国民获得世界银行的采购项目。这方面，目前的世界银行公共投标制度提供了某些保障。然而，美国的立法却规定须派一名美国商务代表处的官员出任世界银行的美国执行董事一职，并在所有区域开发银行任职，以便照顾美国的商业利益。 105 世界银行一些由个别成员国政府出资设立的信托基金被限定须向有关出资国的国民进行采购。尽管其他成员国采取的方式更微妙，但是发展业务也是一大笔生意。国际援助与采购脱钩还不够；它还不应受捐助国利

100 索罗斯论全球化

益的影响。^①

与此同时,必须采取步骤防止工作人员的利益支配世界银行的运作。可以通过规定雇用期限——比如五年,根据业绩好坏可再续一次——来做到这一点。对世界银行行长的任期也有同样的限制。业绩不应由贷款发放的数量大小来衡量。世界银行拥有一大批称职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梅尔泽报告》认为这个班子太大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这些工作人员熟悉当地情况,关心社会问题。但是,他们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限定聘用期有助于为人才短缺的国家提供它们急需而广受欢迎的专业人才。

据梅尔泽委员会计算,世界银行的担保金实际上成
106 了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所给的补贴,这完全是编造出来的。这些担保金从来就没有动用过,因为世界银行的管理层知道持有股份的各国不会容忍。我的看法是,论述应倒过来进行。现在急需提供公共物品,而这笔钱应由富国来出。财富的再分配原来一直是在国家一级进行的,直到全球化使累进税的办法起相反的作用。因此,财富的再分配现在应在全球范围进行。

① 荷兰最近实现了将其货币与援助脱钩,英国也正在这么做,迫使其他国家也仿效的压力正在增加。

结构性改革：多边发展银行 101

执行这项原则的一个办法是,更积极地使用世界银行的担保金从事风险较高的活动。例如,世界银行可以为“小额信贷金融公司”发行的商业票据提供担保。这样做可以大大推动全球的经济增长,因为小额信贷和中小企业融资已经证明是减少贫困的有效办法。不过,如果没有外来资金,小额信贷是不可能有什么长足发展的,因为这是一种不赚不赔的业务。如果世界银行能为成功的小额信贷业务提供额外的资金,那么,小额信贷和中小企业融资就可以成为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尽管这个设想很吸引人,但在当今的世界里并不切实可行。如果真的要发达国家的财政部出担保金的 107 话,它们一定会大叫大嚷。它们不会批准世界银行以这样的方式动用它们的担保金;即使它们愿意,也会拒不提供担保金的补充资金。由于它们的态度,世界银行的 AAA 信用评级可能受到质疑。

依我看,现在对世界银行进行重大改革的时机并不合适,因为任何机构改革都可能导致机构资源的减少。实施特别提款权方案比努力去更积极地使用世界银行的保证金更好。特别提款权方案取得成功之后,改革世界银行的时机也就到来了。到那时,国际金融机构将会

102 索罗斯论全球化

有时间来使新的模式发挥作用,进行建设性改革的氛围
也会变得更为有利。

第四章

109

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实现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必要性没有实现国际贸易全球化的必要性那么清楚。金融市场与实物和劳务市场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后者是同已知数打交道，而前者面对的则不仅仅是未知数，而且实际上是不可知数。

在与已知数打交道时，市场确实会表现出均衡的趋向，但金融市场不同。金融市场对未来作贴现；但是，金融市场对未来的贴现却取决于市场目前对其的贴现。未来实际是不确定的，不太可能与人们的期望对应，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市场预期内在的偏差是影响事件进程的因素之一。预期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互动，我称之为“反射性”。¹¹⁰

市场价格会受市场心理的影响，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但市场价格能影响所谓基本面，了解这种观点的人就不那么多了。比如，互联网和电信业股票价格的高涨

104 索罗斯论全球化

加快了创新的步伐,使新兴公司能以最先进的产品来赢得市场份额。反过来,泡沫的破灭则导致了新产品引入的放慢,使已经确立市场地位的公司如地区性电话运营商能吞噬新加入的竞争者。这改变了许多产品的供求关系,对收益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人们已经提出质疑,最近几年表现出来的生产率加速的趋势在以后的几年是否将会逆转。

我认为反射性提供了一个比均衡概念更好的关于金融市场运作的解释框架。均衡暗示着结果的可确定性,但在金融市场里,结果的不可确定性是千真万确的。在具有反射性特点的情况下,预期与结果之间存在差距,事件参与者不能将决定建立在对事务的认知基础上。他们的判断是带有偏见的,而这种偏见成了决定结果的一个因素。有时,偏见小得微不足道,可以不予理睬,这时可说是出现了均衡状态。其他一些时候,预期与结果之间的差距要大一些,这时我们就应该说是出现了远离均衡的局面。在有反射性的情况下,既可能出现恶性循环也可能出现良性循环,它们一开始都是自我强化的,但最终都自我挫败。

应该强调的是,反射性的影响并不为人们所公认。恰恰相反,经济理论家们由于要尽力获得可确定的结

果，费了很大气力将这些影响抛在一边。金融经济学是建立在效率市场和理性预期基础上的。我认为，理性预期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极其不确定的情况下，如果假定价格是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然后又将自己的预期建立在这种假定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实际上，很少人会这么做。

诚然，一些先进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新一代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已经将反射性现象考虑在内，承认存在着他们所称的“多种不均衡状态”的可能性。但是，一种具 112
有根本性缺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依然占了上风。这种观点现在已危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融市场不仅不朝着均衡靠拢，相反，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很可能会走向极端，最终会崩溃。因此，不能对金融市场放任自流，而应由货币当局加以监督并进行一定的管理。不管从理论上说应该如何，在实际上人们早就承认对金融市场是不能放任不管、听其自然的。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上总是不时出现危机，而每次危机的发生，都导致了管制的加强——中央银行和其他监管机构就是这样长期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的监管构架现在已经相当完善，但是，国际监管构架却没有跟上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步伐。只需反观最近的历史，就能看到这一

106 索罗斯论全球化

点。过去 20 年的特点是危机重重：1982 始于墨西哥并扩展到重债穷国的国际债务危机；1994 年的另一次墨西哥危机和波及拉丁美洲的所谓“特奎拉酒* 效应”；1997 年始于亚洲并在全球蔓延、导致俄罗斯无法履约还债，并以 1999 年 1 月巴西货币里亚尔贬值而告终的新兴市场危机。

这些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使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多少影响。这是因为当中心区国家遭受威胁时，其货币当局采取了适当行动以防止国际金融体系出现崩溃。对于处于边缘区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其中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到了巨大破坏。^① 这就造成了中心区和边缘区的经济和金融业绩出现极大悬殊——边缘国家危机起伏，而与此同时，中心国家却一直相当繁荣稳定。^② 对国际金融体

* 即墨西哥龙舌兰酒——译者注。

① 由于 1998 年 8 月俄罗斯拒绝履约还债，1997 ~ 1999 年的危机呈现席卷国际金融市场之势。美联储组织了营救行动以防止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破产，并在 10 月和 11 月短期内迅速连续三次下调利率。

② 2001 年 6 月杜布罗夫尼克经济会议上，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迈克尔·哈钦森和伊安·纽伯格提交了一篇论文，认为货币和国际收支危机在两到三年内使产出总共减少了约 5% 到 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2001 年 7 月 30 日，第 259 页。

系的主宰使中心区国家享有很大的优势。

全球金融市场创造了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这有悖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种“市场能保证资源的最佳配置”的世界观。一般的规律是，每一次危机伴随而来的都是监管的加强。但实际上，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下，1997～1999年的新兴市场却成了例外。各国对金融和银行的管制有所加强，但总的趋势仍是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减少了在国际层次进行官方干预的作用。 114

没有人会质疑 1997～1999年危机的剧烈程度及其造成的破坏，但是在这场危机的起因问题上，则众说纷纭。主流观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的操作方式干预了市场纪律，鼓励了国际借贷与投资的一种不健康的繁荣，从而导致衰退。其中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许多受影响的国家的银行体系不健全，国家执行的又是不健全的宏观政策。不过，人们认为危机的根源之一是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干预而制造的道德风险，因为贷款者因而相信，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指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拯救难以承担自己义务的国家，从而也就拯救了自己。不管这种看法是否成立，人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可以通过消除道德风险来避免未来的

108 索罗斯论全球化

危机。^①

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金融当局的干预确实带来了道德风险,而这种道德风险确实导致了新兴市场出现不健康的繁荣。我所不同意的是消除这种道德风险的后果。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声称,只需消除道德风险就够了,因为市场纪律会解决所有其他问题。我则认为,金融市场存在着固有的不稳定性,竞争环境存在着固有的不平等性;解决道德风险的问题会引起新的混乱,但这是朝着相反方向出现的混乱局面,反而会造成新兴市场的资金短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发挥更大而不是更小的作用,需采取特殊的步骤来缩小中心和边缘之间的鸿沟。

这个论点不容易解释清楚,因为问题相当复杂,部分原因是所涉内容技术性很强。我准备先对当前情况的来龙去脉做一个简短的历史性介绍,然后再分析1997~1999年金融危机之后所出现的局面,最后才提出一些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张。

^① 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上任后不久就对一位采访者说,未能阻止金融危机是因为未让市场发挥作用。“这与资本主义的失败完全没有关系。这只与缺少资本主义有关。”Gerard Baker and Stephen Fidler, “US Signals More Hand-off Stance on Global Markets,” *Financial Times* (London), February 15, 2001, page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概览

116

1944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布雷顿森林成立的时候，它是为一个以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为特征的世界设计的，其使命是通过确立汇率管理和国际收支的规则，以及对收支不平衡的调整提供临时资金，促进国际贸易增长。

后来，对资本的管制逐步取消，固定汇率制在1971年崩溃。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造成了贸易方面的极度不平衡，当时任由商业银行来提供资金应付局面。主权国家贷款的极度膨胀导致了1982年出现危机。维护国际银行体系成了首要任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制定了一揽子拯救方案以使债务国能偿还其债务。各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施加压力，要它们“自愿”延长其贷款的偿还期限，并拿出一些“新”钱以使债务国能支付利息。总的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功地完成了其使命，避免了重大的拒不偿债现象。这就是后来被看成是道德风险的现象的根源：危机出现时可以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求援。

调整的主要负担落到了债务国的肩上。诚然，贷方

110 索罗斯论全球化

- 117 须为坏账建立准备金,而且,在危机已经渡过和银行能够负担之后,大部分欠债以布雷迪债券的形式进行重组,与这种债券所交换的债务相比,它的利率较低,偿还期较长。^① 1989年墨西哥发行了第一批布雷迪债券。但是,总的来看,它对债务国造成的破坏比对银行的要大得多——南美各国失去了十年的增长机会。

1980年代期间,在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实行的放宽或取消管制的自由化政策推动下,国际金融市场继续飞速发展,尽管国际借贷危机仍在逐渐恶化。林林种种的金融衍生工具、合成产品和其他新的金融产品纷纷问世,使整个金融市场变得面目全非。而这正是全球化真正形成的时候。

- 118 1994年,墨西哥再次遇到麻烦。1994年大选之前,它不断举债以维持定价过高的联系汇率。当其货币与美元脱钩之后,债务负担一下子重得难以继续承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前来拯救,美国财政部拨出巨资援助。Tesobonos,即与美元挂钩但以比索标值的墨西哥国库券的持有人获得了足额付款。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道德风险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了。

① 以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的名字命名。

这就是 1997 ~ 1999 年的新兴市场危机出现的背景。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应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要求进行干预。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次采用的方案没有奏效，危机继续蔓延，直到最终席卷全球金融体系中几乎所有的边缘国家和地区。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亚洲金融危机开错了药方。它的方案内容包括，允许该国货币自由浮动、提高利率以遏制货币贬值和大砍政府开支以阻止预算赤字增加。此外，方案中还硬性规定了若干条件，主要是针对银行体系，同时也为了解决其他结构上的弊病，比如印尼的部门垄断。^① 所有这些措施产生的总效果是使经济进入衰退，甚至达到崩溃的境地。这个药方针对的是公共部门的过度干预，但这次危机中的过度现

① 在其亚洲项目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对财政政策的评估是至关重要的。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支持的项目”，IMF Occasional Paper, 第 178 号，1999 年 6 月 30 日。它指出，财政支出的收紧，是为恢复投资者获得偿还的信心，从而减少对资本账户的压力，并避免在可获得的信用减少的情况下对私营部门产生挤占效应。结果，“财政政策的效果差异极大……因为……原来有关经济增长、资本流动和汇率的假设被证明是极端错误的”（第 62 页）。泰国和韩国的财政紧缩为稳定汇率这一首要目标提供了支撑，但在印尼，为对抗银行挤兑而注入的大量流动资金导致基础货币剧增，从而使货币继续贬值（第 38 页）。

112 索罗斯论全球化

象却是出现在私营部门的。

不过,必须要弄清楚的是,到底当时国际货币基金
119 组织有无其他选择?依我看,当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延
长债务偿还期,实行债务重组。如果眼前的偿债压力得
以减轻,货币贬值的势头就能得到遏制而无须将利率提
高到难以承受的水平。这样,对国内经济的破坏性影响
就没有那么大。但我也承认,如果当时真的对债务延
期,可能会对国际银行体系造成破坏,致使危机蔓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国际银行体系的
稳定,因此它不能赞同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实际上,
1997年12月对韩国债务的处理方法接近于延长偿还
期,只不过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施压,使它们就范
而“自愿”重新确定贷款的偿还期限。这种做法使人不
禁回想起1982年,使全球各金融市场都胆颤心惊。危
机最终蔓延到俄罗斯,当1998年8月俄罗斯最终拒还
120 欠债时,只是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及时干预,才
避免了国际金融体系陷入崩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可选择迫使各新兴经济体
开放其资本市场。回顾起来,在美国财政部的领导之
下,国际社会显然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亚洲金融危机爆
发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建议将开放资本市场纳

人其核心目标之中。自那以后这个建议就不怎么有人提起了。

当前形势

1997 ~ 1999 年的危机揭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上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处于这个体系中心的国家可以采取反周期性的政策。例如，在目前经济出现滑坡的情况下，美国一直在大力降低利率和减税。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加的条件却是强化周期的：迫使各国提高利率，减少预算支出，从而把它们推进经济衰退的深渊——与美国在类似情况下的作为截然相反。

过去，金融市场帮它们通过增长摆脱了债务负担，因为市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信心。例如，1980¹²¹年韩国曾经负债累累并陷入了国际借贷危机的泥潭不能自拔，但是它却出色地设法取得了增长，从而甩掉了这个大难题。但是，1997 ~ 1999 年的危机过后，皇帝的新装就被识破了——基金组织的各项方案无法使市场为之所动。于是，受灾国似乎陷入了不断下滑的循环之中。

这并不是个新问题。这是金本位制的特点，也是

114 索罗斯论全球化

1930 年代大危机的核心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始人,尤其是凯恩斯原来的意图是给予赤字国和盈余国对等的待遇,规定这两种国家都有进行调整以恢复平衡的同等义务。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盈余国的影响力几乎毫不存在,而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重负几乎完全落到了借债国的头上。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市场纪律。既然国际金融体系对主宰它的国家来说运转良好,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当然不愿接受这个制度可能具有根本缺陷的观点。他们把 1997 ~ 122 1999 年的危机归咎于受灾国的结构缺陷。即使他们承认制度上有什么缺陷时,他们也将之归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拯救方案所带来的道德风险。

毫无疑问,尽管有夸大之嫌,有关各国一直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也造成了败德风险。但是,如果没有败德风险,国际金融体系又如何发挥作用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拯救方案所造成的败德风险抵消了边缘国家的内在不利因素,使新兴市场国家得以从国外吸引资金。这个体系确实需要改变,但这不足以消除败德风险,还需在体系当中加进某种东西与边缘国家固有的不利地位相抗衡,创造出一个更公平的竞争场所。

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信用担保和其他增加信用的举措。
在危机时期，我很早就一直力主应这么做。^①

实际上，败德风险业已消除。在 1997 ~ 1999 年的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成功地把印尼和俄国的银行挽救出来，使投资者遭受了惨重损失。而且，在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立场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弯——它不再争取把私营部门“救出来”，而是坚持要把它们“拖进去”。这种转变是逐步发生的——1998 年 8 月俄罗斯危机发展至顶点时，败德风险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敏感的问题，制约了金融当局避免俄罗斯无法还债局面的努力。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私营部门必须参加营救巴西的计划。这种做法拖延了进度，加剧了危机，因为商业银行预先减少了所承担的风险。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找一个国家来示范与私营部门共同负担的新政策。它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进行了尝试，最后在厄瓜多尔获得成功。这项原则现已建立，反映在新兴市场债券工具的市场价格当中。

① George Soros, "Avoiding a Breakdown: Asia's Crisis Demand a Rethink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Financial Times* (London), December 31, 1997, page 12. George Soros, "To Avert the Next Crisis," *Financial Times* (London), January 4, 1999, page 18.

116 索罗斯论全球化

当初的理论性观点似乎正在成为现实。新兴市场各经济体资本外流,借债成本也更高了。表 4.1 显示了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流量。从中可见,自 1996 年起,信贷的流量已大大降低。外逃的资本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流入的资本,这一点从表上看不太清楚,是因为其中使用了“居民放贷”(resident lending)这个无伤大雅的术语。如将居民放贷、证券组合投资和私人信贷流量三者加在一起,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自 1997 年起实际上出现了资金净外流,从 1996 年的正 817 亿美元变为 2000 年的负 1060 亿美元,比这稍多一些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资助的资金流入可抵消一部分。

图 2 显示了 J.P. 摩根银行新兴市场债券指数(EM-BI)1991 年至 2001 年的情况。从中可见,风险溢价保持比 1997 ~ 1999 年危机之前高得多的水平。唯一的问题是这一变化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这是暂时性的,我则认为这是结构性的。

不仅市场越来越多地歧视性地对待不同国家,绝大多数情况下金融市场对其他边缘国家的态度也是消极的。向边缘国家放贷、投资或是持有这些国家货币的风险都大为增加。而且,既然这些风险已经反映在资本费

表 4.1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来资金一览表¹(亿美元)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差额	-155	-204	-501	-782	-706	-851	-961	-768	-82	231	392	124	
1. 私人资本流入													
a. 组合投资净值 ^①		59	138	454	294	244	357	257	136	155	163	38	90
b. 私人信贷净值 ^②	228	426	770	965	734	1231	1987	1210	89	-218	203	-221	103
小计(a+b)	228	485	908	1419	1028	1475	2344	1467	225	-63	366	-183	193
2. 居民放贷及其他 ^③	-368	-415	-599	-661	-810	-904	-1527	-1799	-1461	-1202	-1426	-991	
小计(1+2)	-140	70	309	758	218	571	817	-332	-1236	-1265	-1060	-1174	
3. 直接投资净值		234	319	448	672	813	933	1161	1207	1476	132	1244	1080
4. 官方资金净流量	404	358	359	234	262	409	47	367	524	105	-13	296	202
外来资金净额总计	264	662	987	1440	1152	1793	1797	1196	495	316	229	366	517
(1+2+3+4)													

f = 预测

① 对外证券组合投资净值

② 债务分期偿还净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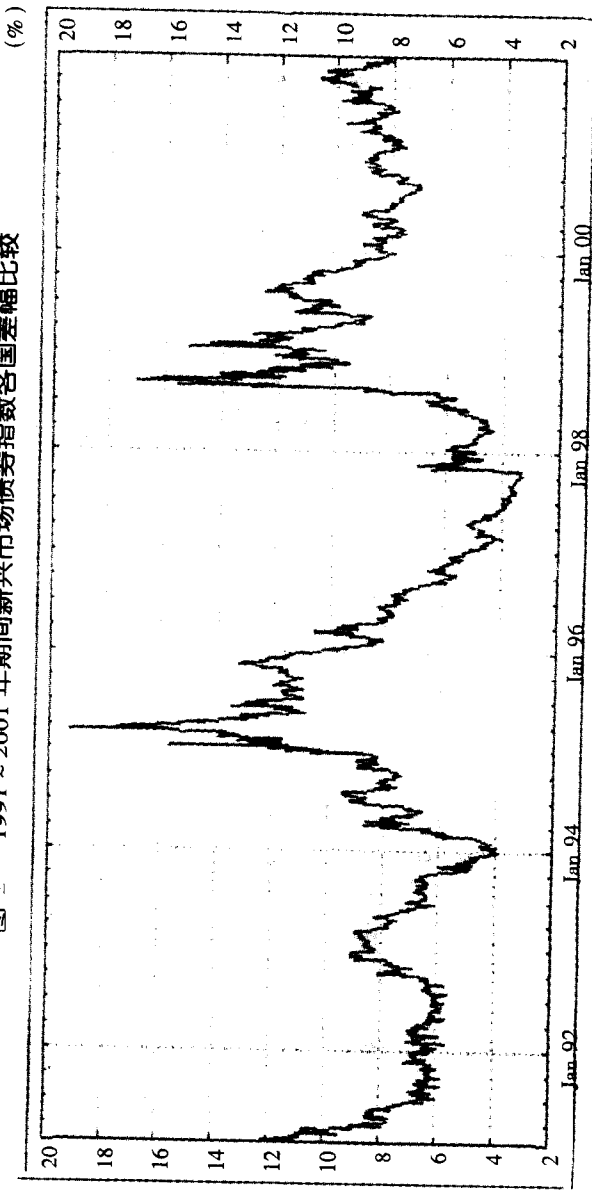
③ 放贷净额、货币化黄金、误差和遗漏

资料来源：美国华盛顿特区国际金融研究所 2001 年 5 月公布的数字。

118 索罗斯论全球化

126

图 2 1991~2001 年期间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各国差幅比较



EMBI 全球指数追踪由新兴市场的主权或半主权实体发行,以美元标值的债券工具,它们包括:布雷迪债券、贷款、欧元债券,以及本地市场工具。所涉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厄瓜多尔、希腊、匈牙利、黎巴嫩、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俄罗斯、南非、韩国、泰国、土耳其和委内瑞拉。资料来源:J. P. 摩根 EMBI 指数,2001 年 12 月。

用升高上,回报当然也就相应减少。边缘国家获得经济增长比以前困难得多,而缺乏进步则造成了政治风险。不公平的竞争场所的另一个表现,是新兴市场的即使最好的公司也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率溢价来筹资,从而损害了他们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使它们很容易成为设在工业化国家的公司的兼并对象。^① 这对南非、保加利亚和巴西等情况相差很大的国家来说,皆是如此。资本费用高昂或者无法获得资本成了新的传染病,这不光表现在缺乏外来投资方面,而且也反映在国内资金外逃的现象。1997~1999年的危机之后,世界各地的储蓄都流到美国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技术泡沫破裂之后,资金在寻找安全庇护所的动机推动下,仍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同边缘地区不一样,在支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方面从来没有出现过麻烦。2000年,这一逆差 128 已占美国国内总产值的 4.4%。^②

① 亚洲的经验表明,如果政府试图通过向国内公司提供直接贷款或其他直接或非直接的补助来抵消这种不利情况,那它们可能就播下了未来不稳定的种子。

②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2000年,全球64%的净资本出口流到了美国,相形之下,1992~1997年这一数字的平均水平是35%。《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和关键性政策问题》(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

120 索罗斯论全球化

目前所缺少的,是一套鼓励资本流向新兴市场的刺激措施。一个错误的纠正引发了另一个错误,这在历史上是常常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人修建了马其诺防线,以便更好地打壕沟战。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战壕却被坦克轻而易举地冲破了。与此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从救出向拖入的转变,也是在试图打赢一场昨日的战争:就是要通过制止不理智的贷款繁荣来避免信用危机。它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是也播下了下一次危机的种子: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因而严重不足。

不存在奇迹式的解决方案

发现问题容易,解决问题就难多了。我前面已经解
129 释过为什么说金融市场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没有什么法宝能改变这种情况。有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金融体系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要提出某些实际的建议来将其负面影响减至最小,理解这些问题就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货币制度问题。不管采取的是哪一种制度,都必定有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病就会露出端倪。固定汇率制过于僵硬,而浮动汇率

制则易产生自我强化的趋势，最终使自身陷入远离均衡的境地。主要的货币都显然受这种模式制约。一种趋势常常保持几年才能出现扭转，从而导致涉及面很广的破坏性波动。^①

联系汇率制，即将某种货币的币值与美元、欧元或一揽子货币挂钩也是无法长期维系下去的。东南亚联系汇率制的崩溃正是 1997 年危机的直接起因。危机过后，有人提出了一种理论，声称在两个极端的任何一端或“极”中可以找到解救办法，即办法不在货币局制度中就在浮动汇率制中。货币局制度比联系汇率更正式、更僵硬。在这种制度下，法律禁止货币当局发行本国货币，除非同时存入同等数量的硬通货。 130

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这种走极端的理论是错误的——货币局制使阿根廷陷入无法维持的境地，而浮动汇率则导致了美元似乎无休止的升值。惟一的长治久安办法是实行单一货币，但全世界还没做好接受单一货币的准备。甚至欧盟在欧元的管理方面也遇到了重重困难。

第二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缺少全球性的中央银

① 有人认为货币的波动并不比某些初级商品的价格变动更大。但这并不能推翻本文这一观点。这两种波动都是破坏性的。

122 索罗斯论全球化

行。没有一种全球性的货币,就不可能有全球性的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作为最后贷款者,因为它对无论各国银行体系还是其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没有控制权。倘若要它扮演这种身份,那只能意味着开空头支票。正是由于缺少最后贷款者才迫使边缘国家实行了助长周期的、反凯恩斯的货币政策。

实际上,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和美国财政部掌管着全世界的宏观经济政策,尽管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也有发言权。^① 大权在握对美国来说十分有利,虽然美国通
131 常不承认这一点。美国当局相当重视国外的情况,但是它的首要责任是在国内;归根结底,这是指导其行动的根本。当中心地区的金融市场遭受威胁时,美国当局就会大力干预;而对边缘国家所遭受的痛苦,它却可以不为所动。

主宰国际金融体系的好处可以通过对德国在 1992 年的作用同它今天的作用相比较来说明。1992 年,德意志银行掌管欧洲汇率机制 (ERM) 的货币政策。东西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估算,美国的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将比基准预测低 0.5 个百分点。见 V. Aurora and M. Cerisola, How Does U. S. Monetary Policy Influence Economic Condi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United States, Selected Issues, IMF Staff Country Report No. 00/1. 12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0)。

德按实际上一比一的汇率实现统一导致了国内通货膨胀压力飚升，而欧洲的其他国家正在遭受高失业和衰退之苦。受银行宪章的约束，德意志银行必须提高利率，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需要的是下调利率。由此造成的紧张关系导致了欧洲汇率机制的崩溃。

今天，德国在欧洲中央银行（ECB）只有一票。欧元的问世并没有刺激德国的经济。与此同时，欧元区的边缘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则由于国内利率降至接近中心即德国的水平而大为受益。结果，这些国家经济状况较佳，而德国的经济却是欧元区里最疲软的。由于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是根据整个欧元区的经济情况制定的，德国正在迅速成为欧洲病夫。这一例子说明，成为体系的主宰肯定会带来好处，不管是穷是富。当然，一般总是富裕、强大的国家才成为主宰。

一些实际建议

倡导对国际金融体系现有的结构进行变革是不切实际的。各个国家的相对实力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发生转变，但是美国是不会放弃其地位的，其他国家也没有能力奋起反叛，与美国为敌。边缘国家也许会觉得留

124 索罗斯论全球化

在这个体系中是十分痛苦的,但是舍它而去也许更加痛苦。

不过,提倡对该体系进行某种改进也并非不现实。

- 133 开放社会是一个欢迎不断改进的不完善社会。目前的金融结构当然算得上是不完善的,对其进行改进会使所有成员国受益,包括美国。像阿根廷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曾处于灾难的边缘,而边缘地区的其他国家正深受高风险溢价和缺乏投资流入之苦,世界其他国家的局面已经成为中心国家的金融当局极为关注的问题。

我已经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改进措施:用特别提款权来提供国际援助。这有助于减少中心和边缘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反周期政策的工具,在世界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尤其有价值。在这里我希望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确定是否可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其他的改进。

我们可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至最近的运作方式中找到两大缺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种主要的不对称情况。一是防范危机和干预危机之间的差距,另一个是对贷款国和借款国待遇的不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遵循的总原则是很明确的:

- 134 防范危机和干预危机之间应该实现更好的平衡,对推行

健全政策的国家进行奖励和对不实行健全政策的国家进行惩罚之间也应取得更好的平衡。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只有通过奖励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能在一个国家遇到危机找上门来之前就对该国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

这些总原则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但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阻碍而没有得到恰当的执行。各国的货币当局过分依赖市场纪律，没有设计出一套适当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制度。如果金融市场实际上趋于均衡，它们的办法也是有理由的，但现在多重均衡已被接受成为经济理论的一部分，这种信念也不再能站得住脚。市场纪律提供了大棒，但却没有提供胡萝卜——尽管不是一点也没有。

通过使用紧急信贷额度(CCL)，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业已在预防危机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紧急信贷额度在一个国家发生危机之前而不是之后就向其提供基金组织的信贷额度。不幸的是，预防危机的愿望与强调市场纪律发生矛盾，而后者是赢家，因为最初订的条件诸多限制，难以吸引人来申请。规定的条件最近作了修订，使这种办法更有吸引力，可用性更强。然而，还是没有申请者。

126 索罗斯论全球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它的主要股东应积极推动紧急信贷额度的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充足的流动资金,这些资金应得到更为积极的使用。如有必要,应为基金组织追加资金。

除紧急信贷额度外,还应采取其他步骤来加强良好政策的激励措施,减少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衡。以下几个备选方案可供考虑: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给各个国家评定级别。级别最高的国家自动享有获得紧急信贷额度的资格,债券持有人会得到保证: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而言,它们应有的权利将得到完全的尊重。这就可以大大提高国家的信用。与此相反,对评级最低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向它事先申明:如果没有私营部门出面一起承担负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不愿实施项目。

136 也就是“买主自行当心”(Caveat emptor)。中间可设一个或多个级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按级别的高低坚持不同程度的负担分摊。

(2) 负责确定国际认可的商业银行资本标准的巴塞尔协定,可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级变成商业银行贷款的相应资本要求。

(3) 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可在其贴现业

务窗口接受经挑选的国家的指定国库券。这种特权只留给特定国家或在特别危险的情况下使用。例如，倘若阿根廷无力还债，就可以把这项特权的使用面扩大，让其他执行完善政策的拉美国家享受。这就会防止危机蔓延至诸如巴西、智利、甚至墨西哥等国家。

(4) 将上面这个建议进一步延伸——也许有点太远，前面提到的这些中央银行也可以将它们的贴现窗口扩至所选国家的更长期的债券，提供随时间不同而不同的贴现。这能减少风险溢价，并帮助边缘国家延长其债务的偿还期。更重要的是，这会使它们运用反周期政策——如果各中央银行能将贴现率定在适当的水平上的话。 137

(5) 另一个办法是，由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商定在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时，部分使用有资格的边缘国家发行的政府证券中最安全的那部分，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有紧急信贷额度协定或获得它的高评级的国家尤应得到照顾。

这些安排会同时减少这两种不对称现象。除了紧急信贷额度之外，还可采取其他步骤以增加对健全政策的奖励，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更好地防止危机发生，因为获得高评级的其中一个要求是，有关国家必须就向

128 索罗斯论全球化

外举债情况收集足够的数据库。这就可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密切地监督该国的欠债情况,如出现宏观经济条件恶化,便可对其降级。^① 同时,对借款国和贷款国
138 的待遇也能得到更好的平衡。执行健全政策的国家的信用将得到提高,而向评级较低的国家贷款的国家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建议中只有一个得到了认真的考虑,这就是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度的要求可以有所不同,而即使有关这一建议的讨论也走向了略有不同的方向。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已接受对国家进行评级的想法,但将让更为成熟的金融机构依靠它们自己内部的风险评估机制来决定分配给它的给主权国家的贷款的资本额度。不那么成熟的金融机构则可以依靠商业信用评级机构。^②

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成员国进行评级的主张遭到坚决反对。一些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敢对一个国家降级,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加速本来要防止的危

① 1997年,韩国中央银行对偿还期不超过12个月的贷款一律不留记录,而尚未偿还的大部分贷款属于此列,从而加剧了危机的严重性。

② 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是欧洲、加拿大、日本和美国等10国集团的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督机构的咨询机构。

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29

机出现。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维护国际金融体系 139
有着机制性的利益，早一些而不是晚一些降低一个国家的级别，可减轻危机的严重性。另一种观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受政治压力左右而无法对一个国家降级。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抵制这种压力的稳固基础，因为如果它判断失误，就得自己掏腰包。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符合规定的国家与不符合规定的国家之间的分界线会造成严重缺乏延续性。但是，货币管理当局有许多办法来减少这种缺乏延续性的现象。它们可以改变它们愿意贴现的国库券的数量，或者改变票据的贴现率。巴塞尔协定可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级来要求不同的资本充足度。

不过，主要的反对意见来自于那些只注重败德风险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担保会不会鼓励不健全的借贷？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由于放贷失误造成危机，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得承担后果，提供援助。这样一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承担实实在在的风险，而不是造成败德风险。这是又一个可表明 140
败德风险的概念是怎样遭到滥用的例子。

最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缺乏区分健全经济政策和不健全积极政策的办法。我同意，这

130 索罗斯论全球化

种反对意见是有道理的,尤其是鉴于最近的发展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处理 1997 ~ 1999 年危机出现失误而现在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使得它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我无法为它设计用以评定各国的方法,但是我毫不怀疑它完全有这种能力,如果赋予它这种责任的话。各国中央银行首次接到防止金融危机发生和保持经济稳定的重任时,也缺乏适当的办法,但它们还是制定出了办法,变得十分成功、胜任。同样的情况也很可能会发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身上。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朝着更加客观、严格地进行评定的方向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就反映制定政策执行情况和金融健全程度的关键指标出台了各种规则 and 标准,这是在与诸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之类的机构的紧密合作下进行的。

在推行本书所倡导的那些步骤之前,先要解决一些重要的法律问题。目前不存在主权国家债务的破产程序,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强制私营部门分担负担的法定权力。除非得到债券持有人的支持,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授权的债务重组计划可能得不到法院尤其是美国法院的批准,法院对很大一部分国际债务有管辖权。但是没有一种机制来使之获得批准。新兴市

场经济体所发行的国际债券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包含有集体行动条款,从而限制心怀不满的债券持有人阻碍重组的能力。而按照美国法律,这类条款是不能允许的。

贷款方要引入破产法院式的保护,可能需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约定条款进行修改,以澄清它的立场,从而可以不介入。^① 迄今为止,投资者们反对进行这样的修改。但是,如果新的不介入规则伴随以前面阐述过的信用改善,债券持有人和投资银行也就没有多少抱怨的理由了。¹⁴²

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和鼓励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正认真考虑创立一个国际破产机制。^② 但还未考虑本书提出的信用改善建议。这是个遗憾,因为两项措施一起实施,会比只有破产程序而没有安慰措施的做法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约定条款第八条第2款b项赋予它进行资本和汇率控制的权力,可以禁止或限制在进行某些海外支付时获得外汇的权利。但在这一领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各国合同法有法律管辖权存在争议。不同国家的法院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关这些问题的综述,见“金融危机的解决与防范:私营部门的作用”, An IMF Issues Brief, March 26, 2001。

② 2001年11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执行副总裁安妮·克鲁格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于华盛顿特区的全国经济学家俱乐部成员年度聚餐会上的致词。

132 索罗斯论全球化

容易实现。

问题很紧迫。阿根廷已无力偿债。不良兆头早已显现,金融市场已经发现凶多吉少——尤其是在它们自己就是元凶的情况下。惟一要问的问题就是,债务重组是有序还是无序地进行。答案很大程度上、但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能克服感到不满的债券持有人的反对,提供援助来使债务负担能有序地减轻。¹⁴³当然,阿根廷还需满足其他的条件来获得接受国际援助的资格,但这一问题的模糊不清正是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的障碍。

说阿根廷的偿债问题是无序的也许还说得太过轻。它的全部影响还有待于显现。阿根廷前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略实际上将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了维持货币局制度、并承担国际义务这个祭坛上。国内养老金计划和银行体系的健全性受到了损害,国内储蓄无处可逃。打击一旦到来,就会是很猛烈的,人民骚乱,政府倒台。根本没有退路,金融体系完全陷入停顿。对阿根廷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对国际金融体系也造成了负面的冲击——尽管金融市场还未认识到这一点。市场最初的反应是舒一口气,因为几乎完全没有蔓延。由于阿根廷不能偿债早在预料之中,这已经完全被贴现。然而,人们还没

有认识到它的长期影响。外国直接投资——银行、公用事业和石油业投资——受到了沉重打击。广泛的合同违约现象将危及外国直接投资，而这目前被认为是流向新兴市场的最稳定、最可靠的资金。危机的蔓延会是缓慢的，因为直接投资比其他金融资产运动的速度慢得多，但它多半会蔓延开来。西班牙的银行和公用事业公司在阿根廷遭受了损失，它们也可能会从其他新兴市场收缩，尤其是如果股票市场对这些公司的海外投资予以惩罚的话。其他的对外直接投资者，尤其是金融部门的投资者，肯定也会受到它们命运的影响。全面收缩会发展到哪种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反应。 144

阿根廷的混乱局面很可能使事态进一步发展。目前这种安排的缺陷，即边缘国家资本短缺的不断加深，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报酬的不断上升将变得越来越严重。如何有序地处理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偿债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可能的结果就是某种国际破产机制。这将损害支撑着国际借贷的纪律，因为与公司借款者相比，主权国家不能提供任何实际的保障；贷款者所能获得的惟一一种保证就是借款者如果不能偿债，它将要付出痛苦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私营部门如此强烈地反对任何一种能减少痛苦的举措，不管它是包含在主权国

134 索罗斯论全球化

家发行的债券中的集体行动条款,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欠债放贷”措施。集体行动条款使大多数的债券
145 持有人可以克服少数几个感到不满的人反对,同意进行
债务重组。欠债放贷是在新兴市场危机时引入的原则,
它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给拖欠其债券持有人债
务的国家。这两种措施都是对付道德风险的新方法的一
部分,它们坚持要将私营部门“拖入”而不是“救出”。
阿根廷将永远不会有道德风险问题,但它也展示出,无
序的不能偿债问题能带来多么大的危害。

不管是否引入国际破产程序,新兴市场缺乏资本的问题都将变得无法忽视,我所提出的信用改善问题也必须考虑。因此,阿根廷危机可能会促进我这里所倡导的新金融结构的诞生。它将与目前的状况不同,将给采用健全的政策边缘国家提供更多的甜头。

正如以前提到过的,确定健全的政策究竟由什么构成是最大的挑战。阿根廷危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总体而言,阿根廷采用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统教义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它的问题源自经国际货币基金
146 组织创立之初时批准的货币局制度,这一制度最终导致
货币失调。重新坚持联系汇率制是有道理的,但阿根廷
政府及其相当大一部分的公共舆论都坚定地支持货币

局制度安排：它们决心不回到曾把阿根廷推进数十年货币贬值境地的浮动汇率制上去。此外，货币的稳定是在多年痛苦的经济衰退后它们所能显示的惟一成就。这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陷入了困境：要么支持一种它们认为不健全的政策，要么让阿根廷陷入无力偿债的境地。起初，它们选择了第一种办法，但最后它们换成了第二种。这一过程简直就像一部希腊悲剧。

这也表明，就国际金融体系而言，没有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不管我们设计出什么样的办法，总会产生新的问题。恐怕我在这里提出的这些建议在实施时也会被证明是不够的。实际上，和它们想解决的问题比起来，它们似乎微不足道。

在当局连这里所提出的温和方案都不准备考虑的情况下，我认为提出激进方案不会有什么益处。它们首先必须认识到金融市场并不趋于均衡；金融市场需要看得见的手的引导，使这个市场的发展不至于出轨。今天，这只看得见的手就是得到华盛顿共识支持的美国。这造成了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竞争场所。想要公平的竞争场所是乌托邦；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要求使竞争场所变得不那么不平等并不过分，这对所有各方的利益都有好处。

136 索罗斯论全球化

这一观点一旦成为西方七国的官方观点,我提出的这些并不完全的改革将大大有助于使国际金融体系变得更稳定、更公平。比如,正像本书提出的,主要的中央银行在其贴现窗口接受有健全政策的边缘国家所发行的票据,将会大大降低这些国家的借贷成本。这并不是全部。我们必须继续改善制度安排,因为我们无法实现完美。

结 论

149

迈向全球开放社会

“9·11”的经历所带来的心灵创伤难以愈合。恐怖分子杀害大量的无辜平民,并在此过程中自我毁灭,这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震惊。这次袭击令人难以置信地大胆,其效果甚至超出了实施者的预期。电视将这个事件带进了千家万户,人们惊恐不安。美国坚不可摧的幻境破灭了。

这种痛苦而难忘的事件对人们造成两个层次的影响:本能的和理性的。如果创伤足够大,这两个层次可能暂时脱节。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性会逐渐占据上风,但人们的记忆长存。我们仍在努力让自己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已经动摇,正积极努力来重新调整。美国人民被迫认识到,世界上的其他人对自己与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差异很大。他们渐渐认识到,国外 150 发生的事能对他们产生直接的影响。这带来了难得的机会来重新评估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在前面诸章中,

138 索罗斯论全球化

我谈的是国际贸易与金融机构；这里我将更直接地关注美国的作用。

正如本书的分析已经表明的，美国占据着全球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如果有谁主宰着经济政策，那就是美国。美国不能为所欲为，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它的认可，什么也做不成。

美国对“9·11”的反应表明，美国还是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军事强权。它在军事上的优势比过去更大。它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完成苏联数年都未能完成的事：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阿富汗。而且它能从半个地球以外做到这一点。自沙漠风暴行动以来，炸弹已变得更加聪明。综合其军事和经济力量，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无可质疑的霸权。

霸权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其他国家必须对美国的
151 政策做出反应，但美国需选择其他国家要做出反应的政
策。我们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当然是有限的。我们要在不完善理解的基础上行动，而我们的行动会有未曾预料到的后果。结果很少能符合预期。但在这种限制下，我们有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这个世界应是什么样。幸运的是，人们开始思考对外政策；因此，美国可能将担负其自己的责任，就像它在过去所做

的那样——比如,我就想到了马歇尔计划。

美国的地位在“9·11”之前和之后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尽管阿富汗战争是对我们军事力量的令人难忘的展示。但美国人只模糊地认识到他们的支配地位。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平等的竞争场所中竞争,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竞争性的。仅仅十年前,还有许多人警告说美国正输给日本。因此,美国领先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自豪的源泉。

全球化的根本原则是竞争。全球化的趋势确立之后,竞争也更为激烈。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经济地位,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一个显然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利益的体系。“9·11”恐怖袭击改变了一切。人们感到需要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当他们开始考虑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他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占有的支配地位。 152

一旦认识到我们所处的霸权地位,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塑造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权力,一个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我们应如何使用这种权力呢?

我将简述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两种非此即彼的设想。它们并非真正相互替代的;现实必然是两者之间的某种妥协。将它们作为非此即彼的选择提出来,是因为我希望更清晰地关注我们所面临的选择。

140 索罗斯论全球化

这两种设想其实并不新。它们在历史上一直影响美国的政策。我将它们称为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和开放社会理想主义。亨利·基辛格指出,美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一个让强烈的理想主义影响其对外政策的国家。这与其来源有关:美国是在《独立宣言》的基础上建国的,该宣言就是对我称为开放社会的普遍原则的富有说服力的阐述。^①

地缘政治现实主义以国家的利益为基础;开放社会理想主义则强调人类的利益。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普遍原则与国家主权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随着美国变得强大,这种紧张关系也变得更为突出。西奥多·罗斯福可以被看成美国霸权的倡导者,而伍德罗·威尔逊代表着处理国际事务时的理想主义方式。然而,他也不能被视为开放社会理想主义的完善代表,因为他的国内民权纪录不佳。吉米·卡特是个更纯粹的典范。当地缘政治现实主义与开放社会理想主义发生冲突时,前者通常会胜出。

冷战可以被理解为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冲突,或是有

^① “开放社会”一词在《独立宣言》发表之时还未出现。1932年,亨利·伯格森在《宗教和道德的两个来源》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来源之一是部族性的,支持封闭社会;另一个是普遍性的,能带来开放社会。

关社会应如何组织的观念即开放社会还是封闭社会间的冲突。实际上,冷战反映了这两种冲突。冷战是美国历史上把两种设想多多少少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时期 154 之一(在美国参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另一个这样的时期)。当然,冷战期间哪一种设想优越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越南战争期间,它们非常明显地冲突。但如果把冷战那段近半个世纪的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美国成功地将两大超级大国之一和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这两个角色结合了起来。面对共同的危险时,其他民主国家都自愿服从美国的领导。最重要的是,美国最终胜利了。

在前共产主义集团崩溃、苏联帝国和苏联自身先后解体后,选择这两种设想中的哪一种的问题更突出地显现出来。奇怪的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下,人们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像二战结束后马歇尔计划在欧洲所做的那样向前共产主义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当我尽我所能地帮助前共产主义国家实现向开放社会的转变时,曾觉得非常孤独)。结果,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丧失了。而美国公众至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选择了 155 地缘政治现实主义道路。

“9·11”之后,美国公众比从前更多地认识到,世界

142 索罗斯论全球化

其他地方发生的事能直接影响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很重要的选择要做。这种意识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决心不让这个时机白白流走。

必须毫不掩饰地表明的是,美国所选择的道路已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不管从经济还是军事角度来看,我们都拥有支配性的地位。这自然而然地、阻力最小地带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倾向。这是成功的:我们已经确立了无可质疑的领导地位,并且应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这种地位。我们已登上顶峰,必须留在那儿。竞争是经济和军事事务的指导性原则,而其目标就是要取得胜利。

在经济领域,消除所有对追逐利润的障碍最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由于拥有巨大的市场和健全的保护财产权的法律制度,通过提供有利于企业经营的环境,我们能吸引资本和企业家。欧盟能提供更大的市场和
156 同样健全的法律体系,但其企业经营环境远不是那么有利。劳动力市场僵化,对雇用和解雇人员有很大的限制,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管制规定。美国实际上吸收了来自欧洲和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资本。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4%以上,而美元仍然强劲不衰。

由于拥有主要的交易货币,且能主宰自己的经济政策,开放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是非常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实际上采取的也是这种政策,这有时会给那些金融体系不能在竞争性环境中高效运转的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比如,日本建立了非常高效的工业体系,但其金融体系遵循的却不是市场信号而是大藏省的指令。金融市场开放后,金融体系浪费了它的工业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日本陷入了它自己似乎无力摆脱的金融危机。

开放的市场有时会损害某些特定的产业,但当这种痛苦以及政治压力变得过于沉重时,美国有足够的力量来实施贸易限制。世界贸易组织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发 157
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影响助长了这一点。可以发现,全球化的作用对美国来说就像一种吸引力,两大政党都支持全球化,尽管它们的政策在某些细节上可能有所不同。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还继续维持着强势军事地位。其武装力量的规模缩小了,但在技术创新方面并未放松。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比过去更大了。这反映在预算中:在世界总军事支出中,美国所占的比例高达 37%。^①

① 这一材料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144 索罗斯论全球化

在军事方面,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有重大差别。布什总统决心利用目前美国所拥有的技术优势继续领先,不允许国际协议对此形成障碍。冷战结束后,北约已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影响力;它已成为美国不怎么看重的那些多边机构中的一个。相形之下,国家导
158 弹防御系统(NMD)却有可能重建美国在冷战期间享有的单方面控制,但这一次不再有一个能带来完全毁灭的敌手。布什政府上任时已决心不顾一切反对地推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9·11”并未使之改变这一路线。克林顿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要含糊得多;它推迟到大选后才做决定。

必须承认,与克林顿政府的政策相比,布什政府的政策具有更强的内在连续性。它毫不掩饰政策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而克林顿总统则将坚定的经济竞争力追求与颇有些感情用事的国际事务中的维持和平努力混杂在一起。而军事上的强硬立场和经济领域的市场纪律则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确保美国的总体霸权。

从政治上看,恐怖袭击为布什政府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敌人,可用以证明其强硬军事立场的必要性。“9·11”之前,布什政府一直在苦苦寻找一个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可以之为对象的敌人。它认为,至少在近期,北朝鲜适

合充当这样一个角色。布什总统对韩国总统金大中施加压力,要他放弃使北朝鲜介入它从未做过的事情的努力。从较长的时期来看,布什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 159 战略对手,即使俄罗斯也仍在候选之列。恐怖袭击提供了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布什总统毫不犹豫地宣布进行反恐战争,而全国也都团结起来支持总统。很难理解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怎么能防范恐怖袭击,但以他目前享有的支持率,布什总统毫无困难地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并继续推进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布署。

恐怖主义是理想的敌人,因为它是无形的,因而也不会消失。对其他的敌人的需要减少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悲剧所带来的几个有正面影响的副产品之一。一个能造成真正的且广为人知的威胁的敌人,可以非常有效地将国家团结在一起。当主流意识形态以不加掩饰的个人利益追求为基础时,这特别有用。

但这种情况也并非不存在危险。在战争状态下,总统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批评的。而批评是开放社会的基 160 础。目前,批评实际上已被抑制。作为反对派的民主党不愿批评总统,而司法部长竟然宣称任何反对反恐措施的行为都是没有爱国心的行为,是对敌人的帮助和支

146 索罗斯论全球化

持。^① 开放社会在美国受到了束缚。我们可能再次丧失迈向全球开放社会的历史性机遇,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明显。

在真正的紧急状态下,政府正在做许多必须要做的事,这时很难对其政策进行批评性的考察。我将努力解释我们正错过的历史机遇,而不是努力寻找错误。

我们是今天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强权。在确立有关全球化和世界未来总体性的讨论条件方面,我们有很大的决定权。如果将所有努力都集中于使我们的支配地位永久化,那我们就会错过历史性的机遇。美国应更多地注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以及人类整体的命运。它必须这样做,既为自己、也为人类的生存。在这方面美国不能也不应单干。需要合作的努力,但这没有美国的领导不行。

我们的霸权很稳固。从军事方面来说,几十年后才可能有另一个国家能对我们形成挑战。可能最想这样

① “对那些将美国人与移民、公民与非公民对立起来,那些用丧失自由的幻象来恐吓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人,我的回答是:你们的做法只会帮助恐怖分子,因为这些做法损害国家的团结,动摇我们的决心。这些做法为美国的敌人提供了弹药,而使美国的朋友犹豫。这些做法使善良的人们面对邪恶时保持沉默。”引自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做证时的证词,2001年12月6日。

做的国家是中国,但中国在军事技术上远远落后于俄罗斯,尤其在航空方面。从能力上来说最有可能对我们的军事优势形成挑战的是欧盟和俄罗斯。但欧盟还根本不是一个军事强权,组成欧盟的各国是美国在北约的亲密盟友。俄罗斯关心的主要是经济发展。它试图重获大国地位,部分是因为自我认同,部分是因为这可能是一种很划算的投资,但它不会重复苏联以牺牲经济繁荣和发展来换取超级大国地位的实验。布什政府起初对俄罗斯很冷淡;“9·11”之后它们的关系显著地热络起来。这种新关系的基础几乎完全是地缘政治的。双方 162 都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但规则是美国定的。我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美国对俄罗斯未来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美国霸权的稳固性稍差一些,但威胁更多地来自体系本身而不是来自美国在体系中的地位。全球同步衰退这一事实对这一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现在似乎都很容易出现了。但美国经济比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强大得多,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很困难的。^①

① 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当时的日本大藏相神原英资建议投入大量的财力来成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在美国的压力下,这一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了。

148 索罗斯论全球化

尽管没有哪个国家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如果我们未能履行我们的领导地位所带来的责任,我们也就处于危险之中。这就是“9·11”真正的意义:它使人们认识到我们处于危险之中。谈论不对称威胁是一种时髦。
163 它们之所以是不对称的,就是因为它们不能很好地被纳入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公式。

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不能用我们赖以确立霸权的那种准则即市场纪律和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来理解。这两种准则都与权力相关。但我现在谈论的责任却是道德责任。这是美国的政策缺少的东西。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它只是被占据主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挤到了一边。

我们渐渐地不再相信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因为那些原则很容易被曲解。很难区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就什么是正确的达成共识就更难了。为不道德或非道德的行为寻找道德理由要容易得多。道德可能酿成伪善,并导致滥用。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都以道德的名义犯下。“9·11”正是其中最恶劣的例证之一。

道德的曲解使我们十分反感,以至于我们试图撇开道德行事。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最显
164 著的特点都是非道德性——根本不考虑道德问题。这

正是它们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它们的成功迷惑了我们,使我们认为不考虑道德是可行的。我们开始崇拜成功。我们崇羨那些发了财的商人,那些当选的政客,而不管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一切的。

这正是我们出问题的地方。没有道德,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生存。我们即使是非道德的追求也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声称对自身利益不受限制的追求有利于公共利益;而我们地缘政治权力的运用符合爱国主义的要求。然而事实是,这些仍然是非道德的追求。如果只有这些,那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很可能被那些道德仍发挥核心作用的更为传统的社会所拒绝。在与政教甚至尚未分离的传统伊斯兰社会打交道时,情况正是如此。最终,我们自己可能也不会满意。

在谈论道德时,我所指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遵守宗教观念或礼仪标准。在政教分离的社会里,这些都是私人事务。我指的是接受与归属全球社区相关的责任。这些责任目前并未得到明确的定义。我们的国际安排基于国家主权,而国家是按自己的利益行事的,并不一 165
定与生活在那些国家中的人们的利益相一致,与人类整体利益相一致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后面这些利益需要得到比现在更好的保护。

150 索罗斯论全球化

我们从“9·11”得到的教训是道德在国际事务中应当起更大的作用。我们所面临的非对称威胁来源于我们已经在全球化中发现的不对称：我们拥有全球市场，但没有全球社会。而如果不把道德考虑进去，我们就无法建设一个全球社会。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在以任何形式为恐怖主义开脱。我强调的是，全球化和美国霸权地位的道德基础不足。市场是非道德的，对自身利益不加限制的追求并不一定有利于公共利益，而军事实力的使用并不一定正当。这样说也许不受欢迎，尤其是在无辜的人被以扭曲的宗教信仰的名义杀害之后，可这是事实。“9·11”之前我就表达过同样的观点。

由于占据着支配地位，美国对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没有它的合作，国际协议不可能实现。但如今的美国却是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它顽固地反对任何有损于美国主权的国际协议。美国所反对的协议可以开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禁止地雷条约》，《京都议定书》，国际劳工组织的许多公约，以及更多的艰深的条约如《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只有九个国家尚未批准后一个公约，美国就是其中之一。只有一个领域美国愿意使其主权服从国际机构，那

就是促进国际商务。“9·11”之前,布什政府甚至不愿意接受经合组织监督金融交易的标准。“9·11”之后,在发起打击恐怖分子的战争方面,它仍不愿在其主权上妥协。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它并不一定要这样做,因为它声称自己的行动是自卫。

正是在这一点上,霸权的追求与全球开放社会的构想发生了直接冲突。霸权主义的观点是能容忍对其他国家的主权的侵犯,但坚持在各个方面保护美国的主权。它想让美国成为推动者,但它自身不动。全球开放社会的设想要求美国遵守适用于其他国家的那些规则。¹⁶⁷此外,它还要求美国在加强国际机构、规则、法律和标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由于国家主权妨碍了大多数规则、法律和标准的执行,它必须愿意提供诱惑和激励措施来实现自愿的遵守。当然,不能指望美国单独遵守,但它必须采取主动以获取其他国家的合作。

毋须赘言也能知道,这一设想与美国目前的政策大相径庭。这并不是个政党政治问题。在保持霸权主义的观点方面,布什政府比克林顿政府更有连续性,但这一政策是两党都支持的——而两党也都有对全球开放社会表现出更多的理解的人。

霸权主义的观点被认为是讲求实际的、现实的,而

152 索罗斯论全球化

全球开放社会的设想则容易被看成乌托邦。恕我不能苛同。我承认,从符合目前形势这一点来看,霸权主义的看法是现实的,但作为一个被追求的目标,它比全球开放社会更为不实际,更会产生相反效果。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成员对其他成员的利益没有给
168 予足够的关注,没有哪个霸权能维持下去。因为其他成员将联合起来打破霸权。这正是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巨擘亨利·基辛格所信奉的权力均势理论的基础。而美国现在所拥有的是比均势有利得多的局面,我们享有绝对优势。如果不能履行责任;我们很容易把自己降至权力均势系统中低得多的位置——这并不是个很诱人的前景。当然,这不太可能很快发生,因为我们的霸权非常稳固。我们可以不负责任地行事,因为得几十年后其他国家才能形成足以对抗的力量。

这正是不对称威胁起作用的地方。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强大到足以制造均衡,人们可能起而反抗这一体系。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无力对付不对称威胁,因为它是以国家间的关系而不是各国国内所发生的事为基础的。

现有体系可能足够强大,能镇压这些不对称的威胁,但镇压而不是消除其根源,有可能改变体系的特性:
169 它将以镇压而不是合作为基础。这是使霸权主义观点

走向其合乎逻辑的结论的必然结果。历史表明,没有哪个镇压性的政府能永远存在——尽管有些能持续很长时间。能长期保持权力的帝国——罗马、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都寻找满足其治下的人民的需要和抱负的方法;那些依靠镇压的帝国无法长久——纳粹德国和苏联可以作为例证。这也是我认为霸权主义的观点带来相反效果的原因。当然,美国不可能成为纳粹德国或苏联,我们的政府体系不可能允许。我只是指出霸权主义看法中内在的危险。

由于同样的原因,全球开放社会的设想也根本不是乌托邦。开放社会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我们要在理解不完善的基础上行事。完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让自己满足于一个不完善的但欢迎改善的社会。对不完善性的接受,伴随着对改善的不懈找寻,以及愿意服从批评性的检查,这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指南性的原则。这些原则表明,真实的东西并不一定理性——这就是说,一个占优势的体制很容易出问题,因而需要改进。而理性的东西也许是无法实现的。即,改进必须基于已有的 170 和可能的条件,而不能由某些抽象的理性分析来独断。

开放社会的原则在民主式的政府和市场经济中都有表现。但要努力将这些原则在全球范围内运用,我们

154 索罗斯论全球化

碰到了一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国家主权。

主权是个已经过时的概念。其根源可追溯到《威斯特法利亚和约》(1648年)，它在三十年宗教战争结束后缔结。人们决定，主权国家有权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在法国革命中，当人民起而反抗统治者时，他们所获得的权力也就是主权。现代民族国家就是这样诞生的，它的主权属于人民。从那时起，民族国家与有关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普遍原则之间就一直存在紧张关系。

主权观念可能是过时了，但它仍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在创建全球开放社会方面，必须将它当作起点来努力。国家可能通过国际条约来让渡部分主权。欧盟成员国在让渡其主权方面已走得很远。欧盟的未来将表明，在这条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

培育开放社会而又不损国家主权的方式之一，是对各国提供正面的激励，促使它们自觉遵守国际规则 and 标准。这一想法贯穿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实际建议的始终。“9·11”之后，将这一想法进一步推向深入似乎是适当的。

在我的前一本书《开放社会》中，我已经提出建立一个自愿基础上的同盟，它有着双重目标：在各国促进开

放社会；确立全球开放社会的框架。“9·11”之后，下述原则应得到普遍的接受，那就是：开放社会促进其他国家的民主、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发展符合大家共同的利益。也需要建立某种行为标准，包括不庇护恐怖分子，不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如果没有恰当的核查和实施机制，这些都不可能有效。这方面的需要是迫切的。就像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生物武器的使用是无法逆 172 转的。

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它可能选择采取单边的或多边的行动。认为美国能单独实现这些目标是荒唐的，但这种想法却被认真地考虑着。大家普遍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在制造生物武器，他的统治给世界带来了真正的威胁。问题是，对此能怎样呢？布什政府的某些人主张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但即使对伊拉克的战争像阿富汗战争那样成功，问题也不会消失。其他国家还会生产生物武器。重要的是，布什政府中没有人公开主张采取多边的解决办法。可这是惟一可能成功的办法。

布什政府拒绝完成谈判以更新 1972 年《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因为它认为其中核查的规定干预过强，其他方面的措施则没有效果；它需提出一个更强有力的条约。新的多边条约应强制所有国家遵守严格的核查要

156 索罗斯论全球化

求,不管它们是否签署了条约。条约的签署国应同意对
173 那些拒绝签署的国家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萨达姆·侯
赛因要么得屈服,要么得承担后果。

在联合国的领导下缔结这样一个条约是可取的,但
如果这不可能,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愿的同盟来推行
其意愿应该还是可能的。自然,美国和其他签署国必须
同样遵守那些它们想强制其他国家遵守的规则。

如何处理核武器也应重新受到重视。目前的安排
是不稳定的。存在核不扩散条约,但这并非长期性的解
决方案,因为它试图维持不公平的局面。它创建了一个
核俱乐部,它想将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排斥在俱乐部之
外。最初,成员许诺自我克制,但它们未能使实施机制
生效。这促使那些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想加入俱乐部,
而如果拥有开发核武器的意愿,那么现有成员的默认就
174 只是个时间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成员越多,也就越容易闯进俱乐部。

相形之下,冷战期间的形势要稳定得多。双方相互
对峙,都拥有即使在先遭到攻击的情况下报复并摧毁对
方的能力。这为确保相互摧毁(非常恰当地被简称为
MAD)提供了一种遏制因素。

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核战争的危险,但有关如何

预防的思考非常少。这又与冷战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时最聪明的人都在全力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全新的方法，而我太过业余，提不出来。必须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全面核裁军是有道理的，^①但我不认为它是健全的政策，因为它给流氓国家太多的机会来破坏规则。我确实坚信能设计出这样一种体制，核大国会在国际控制之下大幅削减其核武库，同时建立起更强有力的防扩散机制。可能会有人指责我过于相信国际控制，但我确实相信，如果美国以自己的力量给予支持，国际控制的作用会大得多。不管怎样，这不是一个具体的建议，只是一个我们应探索的方向。问题在于，它与目前的情况差异过大，而在平时要进行剧烈的变革是困难的。然而，等到时机变得更不寻常时再行动，恐怕是在与命运开玩笑。

布什政府决心通过单方面推行布置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政策来使军事上的优势永久化。^②这一政策是可

① Jonathan Schell, "The Folly of Arms Control,"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0, pp. 22—46.

② 美国航天司令部在《2020年展望》中宣布其目标是“在军事航天领域占据优势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投资。将太空军事力量在一切形式的冲突中与作战能力结合起来”。网址为：www.spacecom.af.mil/usspacecom/visbook.pdf

158 索罗斯论全球化

行的,但我认为它很不明智,因为它无法防御非对称威胁。没有国际合作,我们无法使自己免遭恐怖主义的威胁。只有当人们都站在我们这边时,恐怖主义活动才可能被防止。我本希望“9·11”能让人们重新思考,但布什政府似乎从意识形态上就执着于单边主义方式。

我提倡国际合作,有人可能会由这一事实推想认为
176 我反对使用武力。并非如此。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问题上我都主张进行军事干预,并对美国军事优势之大感到高兴。从不完全理解的假定中可以推出,所有的预防危机的努力可能都是无效的,而作为退路,我们最好做好准备,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就要取得胜利。但与我们在军事上的准备相比,我们用于国际援助的努力和资源完全不成比例:2000年,国防开支为3 010亿美元^①,而官方发展援助支出仅 100 亿美元。

没有哪个政府能单靠军事力量生存,靠军事优势来统治世界当然也不可能。我相信,我们的优势之大已足以让我们想想别的,而不是继续扩大这种优势。除非我们能成功地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否则就存在我们的文明遭到毁灭的真正的危险。如果我们的安全受到其

^① 美国预算与管理局(OMB),“用于国防的联邦资源”,2000年财政年度。

他国家的威胁,那我们就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对付这一更大的危险,因为我们必须先集中精力对付眼前的问题,而目前我们惟一面临的威胁就是非对称威胁。我们无法通过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来对付这些威胁。

反恐怖主义需要国际合作和干预性的核查。要证明干预性核查的合理性,美国就必须改变单边主义的霸权姿态,使自己成为多边努力的领导者,以制止对法律和秩序的破坏。我们已不再处于冷战的状态,那时超级大国与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是同一的。布什政府上台时就决心通过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来加强我们的超级大国地位。但其政策建立在过时的世界观基础上。冷战时明确轻易的身份界定已不再有效。我们还必须加强自己作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我们必须组建一个自愿基础的同盟,维持世界的法律和秩序。该同盟将支持国际性安排,并促进各国国内的内部改进。它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激励,如果有必要也不会回避强制执行。

美国应在这方面采取主动。这需要态度上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变化。在平常的时候,这种剧烈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并非平常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文明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当社会体系本身正滑向灾难时,把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改善我

177

178

160 索罗斯论全球化

们在这个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中去是不明智的。美国是这个世界上的惟一一个能改变世界秩序、以全球开放社会来代替华盛顿共识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放弃对狭隘的自身利益不假思索的追求,更多地考虑人类的未来。^①

全球资本主义与全球开放社会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只是着重点的变化,竞争与合作之间更好的平衡,在我们非道德痴迷中重新强调道德。指望改变人性未免天真,但人类能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的追求。实际上,如果没有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感,人类是无法生存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认为让人们追求其自己的利益而毫不考虑社会公益才是对社会公益最有利的,这才是对人性的曲解。正像我以前说过的,我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是全球开放社会的一种扭曲的形式。

这里所概述的全球开放社会并不是一个像前面的

① 有趣的是,当戈尔巴乔夫掌管苏联时,他真正地关心人类的生存,而且他认为会在美国找到有相同意愿的伙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对这位苏联首脑来说是种痛苦而难忘的经历,他确实担心控制像核力量这样危险的工具的僵硬愚钝的官僚体系。戈尔巴乔夫还偿还了苏联欠联合国的债务,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他的“新思维”,可是他的呼吁被美国漠视。

章节中提出的那样的实际计划。但如果按这些建议行事——尤其是按特别提款权建议行事,将是个好的开端。

组建一个开放社会联盟所需要的思考和准备多得多。促进开放社会的目标要与地缘政治现实的需要相协调。政策的突然改变会导致不稳定。我所设想的开放社会联盟不是对我们现有的联盟的取代,而是我们的政策的另一个层面。它的目标是加强那些寻求向民主和现代性发展的社会中的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力量,并以激励而不是惩罚作为工具。即使这被证明是有很高风险的提议,我们也不能不冒这个风险。除非我们能同时让人们展望一个更好的世界,否则反恐斗争无法成功。美国必须以与反恐斗争同样的紧迫感、决心和资源投入来与贫困、无知和压迫作斗争。

附录

181

特别提款权建议

我们建议用特别提款权来在全球规模上提供发展援助和公共物品。较富裕的国家(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易计划”中的定义)将捐赠他们的新额度中的份额；欠发达国家则将他们获得的特别提款权加入他们的货币储备。因此，欠发达国家将因货币储备的增加而直接受益，同时还会因国际援助的增加而间接受益。

该建议将分两个阶段来实施。在第一阶段，美国国会 will 批准发行 214 亿特别提款权(约 270 亿美元)特别专款，前提条件是较富裕国家按某些规则来捐赠其额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7 年已授权进行这次发行，目前正等待美国国会的批准。

特别提款权捐赠只能提供给已经批准的项目。项目将包括在全球规模上提供公共物品的信托基金和为公共和私人合作计划提供资金。在第一阶段，有资格申请的项目将限于三或四个优先领域，如公共健康、教育

和信息(“数据鸿沟”)以及司法体系的改革。政府支持的减少贫困项目不包括在内;它们将留给国际金融机构来支持。

该计划呼吁建立一个由名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下运作,但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将基于公开宣布的专业资格,不听从任命成员的各国政府的指令。委员会将确定有资格申请特别提款权捐赠的项目名单,但它无权决定资金的支出。捐助者保留从委员会提供的名单中选择项目的权利。这样,捐助者与项目、供给与需求之间就会形成市场式的互动。委员会将保证项目的质量,而捐助者需为其所做选择的质量对公共舆论负责。

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将对项目进行监督和评估。

如果与特别提款权一次性特别发行的计划能成功实施,建议的第二步就是按同样的原则进行特别提款权 183 的年度发行。有资格申请的项目范围也将扩大。政府支持的减少贫困的项目也有资格申请,但需受一定的限制,以将资金留给非政府渠道。

特别提款权建议同时为几个目标服务。它可将扩大国际援助的计划与增加欠发达国家的货币储备的计划结合起来。

164 索罗斯论全球化

捐助计划将：

1. 增加国际援助的资金。完全实施后，该计划将大大有助于实现联合国 2015 年发展目标。

2. 确保更公平地分担负担，并消除免费搭车问题。

3. 消除以目前这种形式进行的国际援助的不足，这主要包括

a) 设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确保接受捐助者的利益优先于捐助者的利益。

184 b) 打破政府间交易的束缚；接受国政府不再充当看门人的角色。

c) 改善捐助者之间的协调。

d) 接受方要获得更大的拥有感和参与感。

e) 要有一个反馈机制，推进成功，消除失败。

额外的货币储备的提供将为欠发达国家带来独立于捐助计划之外的有形收益，但捐助计划将大大提高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货币工具的优点。这可以得到以下论证的支持：

- 国际贸易以大约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两倍的速度增长。各国需保持货币储备与进口之间的恰当比例。欠发达国家必须将其出口收入的一部分保留起来作为储备；特别提款权额

特别提款权建议 165

度将减轻这种负担。此外,特别提款权还能减少它们的借贷成本。较富裕国家不需要特别提款权,因为有充足的储备,且有或者有在国际金融市场方便地筹资的机会。通过捐赠其特别提款权,较富裕国家将为它们找到一个很好的用途。

- 1997年以来,贫困国家的需要变得更为迫切,因 185 为新兴市场从那时起就面临着资本外流的问题。
- 新的特别提款权发行增加了全球流动性,可以被看成是通货膨胀性的,但通货膨胀压力已经减弱,全球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却是真实存在的。由于名义利率不能低于零,传统货币工具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已部分失去效力(比如,在日本)。特别提款权可以作为反周期工具,尤其是较富裕国家必须通过捐赠来支出其份额的情况下。

* * *

在各国的预算中应对特别提款权捐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原则上,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只是记账项目,但特别提款权捐出后,它就成了真正的支出。这是将它包括在预算中的理由。但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是用于加强货币储备的——对美国来说,就是加强其汇率稳定基金。但同样

166 索罗斯论全球化

的数量随即被取出并支出,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利息外,货币储备不受影响。中央银行或美国的财政部通常 186
不寻求拨款来支付其外汇储备包括利息的盈亏的变化——这是将捐赠放在预算之外处理的理由。如果特别提款权被当作反周期工具,那么就有理由要求其捐赠要经过预算程序,不过不是在发行时,而是在赎回时。

最后,每一个国家都须在特别提款权是否纳入预算方面做出适当的决定。在这方面反对特别提款权建议的任何人都应提出更好的办法。

索 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请参照本书正文中边码使用)

A

Afganistan 阿富汗,17,85,150,172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反弹道导
弹条约》,159
Argentina, default by 阿根廷,无力偿
债,130,133,136,142—146
Articles of Agreement (IMF)《条款协
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8,141

B

Bain & Company 贝恩同仁公司,83
Balkans 巴尔干,65,85
Bank of England (BOE) 英格兰银行,
136,137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IS)
国际清算银行,76,140
Bank of Japan (BOJ) 日本银行,136,
137

Bassel Accord《巴塞尔公约》,136,
139
Bas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
sion 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138,
140
Bin Laden 本·拉登,17
Biological and Toxic Weapons Conven-
tion 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1972
年),172
Bosnia 波斯尼亚,13,176
aid for 对波斯尼亚的援助,24—
25,65
Brady Bonds 布雷迪债券,117
Brazil 巴西,103,127,136
Bolsa-Escola and,巴西的,Bolsa-Es-
cola 计划,37,84
Bretton Woods 布雷顿森林体系,2,
116,121
Brown, Gordon 戈登·布朗,70,74
Bush, George W. 乔治·W. 布什,52—
53,157,159,162,167

168 索罗斯论全球化

Biological weapons and 生物武器,
172

NMD and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158, 175, 177

OECD and 经合组织, 166

World Bank and 世界银行, 100

WTO and 世界贸易组织, 45

C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 153

Cavallo, Domingo 多明戈·卡瓦略, 143

CDFs, 全面发展框架, 见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rameworks

Chile 智利, 103, 136

China 中国, 42, 159, 161

WTO and 世界贸易组织, 36—37,
39

Clinton, Bill 比尔·克林顿, 158, 167

Cold War 冷战, 17, 23, 68, 153, 154,
157, 158, 174, 177

Commission of Inquiry (ILO) 调查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 40, 41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rameworks(CDFs) 全面发展框架, 66,
81, 99, 103

Contingency Credit Lines(CCLs) 紧急信贷额度, 134—135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公约》, 166

D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153

Development Grant Facility 发展赠款机制(国际开发协会), 100

E

ECB, 见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onomic crisis 经济危机, 88, 111,
112—113, 117, 118, 120, 121, 127,
140—141, 145, 156
cause of 经济危机的原因, 114, 115
IMF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22

Ecuador 厄瓜多尔, 123

Emerging Market Bond Index(EMBI) 新兴市场债券指数, 124—125, 126
(图)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新兴市场经济体

financing of 融资, 124—125(图)

European Central Bank(ECB) 欧洲中央银行, 131, 132, 136, 137

European Union(EU) 欧盟, 130, 161

regional trade 地区贸易, 50

sovereignty 主权, 171

Exchange Rate Mechanism(ERM) 汇率机制, 131

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 汇率稳定基金, 90, 186

F

- Federal Reserve 联邦储备委员会, 104, 120, 136, 137
-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in Mexico 墨西哥发展筹资大会, 52
- Foreign aid 对外援助, 23, 33, 60, 93—94
delivering 援助的提供, 24, 57, 69—73
donors and 捐助者, 24—25, 105
market for 市场, 93
as percent of GDP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7, 18(图表), 19, 21
risks in 风险, 21—22, 25, 68, 94, 95
shortcomings 缺陷, 65—66
- Foreign Commercial Service 美国商务代表处, 104
-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 151, 152—153, 155, 170—171

G

- Geopolitical realism 地缘政治现实主义, 152, 153, 155, 163—164, 168
- Germany 德国, 23, 131
- Global Capitalism 全球资本主义, 39, 161
open society 和开放社会, 178
-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全球金融市场, xi, 1, 5—6, 11

problems with 其中的问题, 113—114

trade and 贸易, 109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B and Malaria 反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 83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vii, viii, x, 1, 3—5, 7, 16, 28, 55, 71, 86, 106, 160

asymmetry and 非对称, 165

competition and 竞争, 151—152

criticism of 批评, 9, 10, 41

development 发展, 2, 117

Global Exchange for Social Investment 社会投资全球交流机制, 83

Global Witness“全球目击者”组织, 41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国内生产总值, 9, 17, 21, 78, 86, 128, 156

foreign aid as percent of 对外援助占的比例(%), 17, 18(图表), 19, 21

human welfare and 人类福利, 9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国际贸易, 184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国民生产总值, 57, 69

H

Hegemony 霸权, 165, 168, 177

responsibility and 责任, 150—151

U. S. 美国, 152, 158, 161, 166—167, 169

170 索罗斯论全球化

High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HIPC)
重债穷国, 66, 99

Human Rights 人权, 11, 14, 27, 33, 34,
35, 36, 37, 45, 48

Hussein, Saddam 萨达姆·侯赛因,
172, 173

I

India 印度, 174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118, 1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UN) 国际发展筹
资大会(联合国), 15, 28, 95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国际刑事
法院, 59, 166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 国际开发协会, 98, 100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国际金融公司, 98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trade institu-
tions (IFTIs) 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
viii, x, 8, 11, 12, 14, 20, 29, 53, 101,
150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FIs)
国际金融机构, 61—62, 66—67,
70, 99, 107, 143, 182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国际劳
工组织 (ILO), 34—35, 166

WTO and 世界贸易组织, 35, 39—
40, 41, 4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2, 20, 62, 64,
66, 74, 99, 115, 121, 123, 128,
130, 133, 141

CCLs and, 135, 见 Contingency Credit
Lines

conditions imposed by 强制要求的
条件, 120

credit lines by 信用额度, 134—135

currency board 货币局, 146

economic crisis and 经济危机, 118,
122, 137, 144, 145

history of 历史, 116—120

mission of 使命, 61, 116

moral hazard and 败德风险, 122—
123, 139, 140

SDRs and 特别提款权, 76—77,
88, 92

structural reform and 结构改革, 134

transaction plan by 交易计划, 134

U. S. Treasury and 美国财政部,
118, 142

World Bank and 世界银行, 97

Inter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国际科
学基金会, 64

Iraq 伊拉克, 60, 172

J

Japan 日本, 151, 156

J. P. Morgan, EMBI of, J. P. 摩根公
司, EMBI, 124—125

Jubilee 2000 movement 千禧年运动,

28

K

- Kim Dae Jung 金大中, 159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 12,
152—153, 168
Kosovo, intervention in 对科索沃的干
预, 176
Kyoto Protocol 《京都议定书》, 59, 166

L

- Labor Rights 劳工权利, 33,
Labor Unions 工会, 32, 41, 45
Landmines Treaty 《禁止地雷条约》,
166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海洋法公
约》, 166

M

- Market Fundamentalism 市场原教旨主
义, 4—10, 20, 114, 121—122, 134,
155, 163—164, 178
Marshall Plan 马歇尔计划, 17, 19, 63,
65, 151, 154
Meltzer Commission 梅尔泽委员会,
101—103, 105, 106
Mexico 墨西哥, 136
crisis 为危机, 112, 117—118
Microcredit Finance Corporation 小额贷

款金融公司, 106

- MIGA, 见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千禧年
发展目标, 15
Millennium Summit 千禧年首脑会议
(联合国), 15
Monterrey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and
Development 蒙特雷筹资与发展大
会, 74, 96
Moral Hazard 败德风险, 114—115,
116, 122, 139, 140, 145
Multination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多边投资协议》, 34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
gency (MIGA)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98—99, 101
Myanmar (Burma) forced labor in 緬
甸, 强迫劳工, 40

N

- NAFTA, 见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NMD) 国家导
弹防御系统, 158—159, 175, 177
NATO 北约, 157, 161
NMD, 见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非政府组织, 32, 41, 60, 68, 82,
100, 183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172 索罗斯论全球化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45, 50
North Korea, NMD and 北朝鲜, 国家
导弹防御系统, 158—159
Nuclear weapons 核武器, 173—174

O

OECD, 见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官方发展援助, 176
Open Society 开放社会, 7, 19, 58—
59, 133, 160, 166, 170
civil society and 市民社会, 20, 26
geopolitical realism and 地缘政治现
实主义, 152, 153
globalism and 全球资本主义, 178
promotion of 推动, 22, 25, 171
September 11“9·11”事件, 171
vision of 设想, 167, 168—169,
178—179
Open Society Alliance 开放社会联盟,
171, 179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 22, 52, 70, 166

P

Pakistan 巴基斯坦, 174
Partners in Health 健康伙伴研究所,

82

Pearson Commission 皮尔森委员会,
21
Poverty 贫困, 14, 23, 80, 81, 99, 182,
183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
(PRSP) 减少贫困战略文件, 66,
81, 99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2, 3,
117
Richelieu, Cardinal 黎塞留红衣主教,
12
Romania 罗马尼亚, 123
Roosevelt, 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153
Russia 俄罗斯, 65, 159, 161, 162
crisis and 危机, 122, 123
IMF a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63—
64

S

September 11“9·11”事件, xi, 17, 53,
175
foreign policy and 外交政策, 155
impact of 影响, 28, 149—152, 158,
162—163, 165, 171
OECD and 经合组织, 166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中小型企业, 51, 106
South Korea, market crisis of 韩国, 市
场危机, 118, 119, 121

索引 173

Soviet Union 苏联, 62, 63, 150, 169
collapse of 崩溃, 68, 154
loans to 贷款, 23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 特别提款权, 28, 29, 107, 133, 179, 181—186
allocation of 额度, 77, 81, 86—88, 89, 96, 184, 185
donation to 捐赠, 90—91
foreign aid and 对外援助, 78, 88
LDCs and 欠发达国家, 181, 184
proposals for 建议, 73—75, 78—96
Stability Pact for South and Eastern Europe 《东南欧稳定条约》, 85

T

Taxation 税收, 4, 49, 71, 72, 106
competition and 竞争, 51—53
Terrorism 恐怖主义, 53, 68, 158, 159, 165, 175, 177, 179
Thailand 泰国, 118
Thatcher, Margaret 玛格丽特·撒切尔, 2, 3
Tobin, James 詹姆斯·托宾, 70
Tobin tax 托宾税, 70—72
Trade 贸易, 11, 14, 31, 32, 36, 45, 50, 51, 60—61, 109
GDP and 国内生产总值, 184
sanctions 制裁, 41, 43, 59
Trade 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议, 34, 38, 48, 51

Trade 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34, 38, 48, 49, 51

Tuberculosis (TB) 肺结核, 81—83

U

Ukraine 乌克兰, 123

United Nations (UN) 联合国, 11—13, 14, 21, 59, 67, 173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4, 85, 86

United States 美国

economic crisis and 经济危机, 127

role of 作用, 152—153, 166

SDRs and 特别提款权, 91, 96

world order and 世界秩序, 178

U. S. Treasury 美国财政部, 118, 120, 130, 142, 146, 185

Uruguay Round 乌拉圭回合, 49, 54

W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国际发展白皮书, 54—55

Wolfenson, James 詹姆斯·沃尔芬森, 99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2, 22, 63, 66

criticism of 批评, 101

IDA and 国际开发协会, 98

174 索罗斯论全球化

IMF a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7	47,54,55,157
loans by 贷款,60,98,103,106	budget for 预算,53
NGOs and 非政府组织,100	criticism of 批评,32,33,40,53
role of 作用,61,99—100,102—103	enforcement by 强制执行,36—37
TB plan and TB 计划,82,83	ILO and 国际劳工组织,35,39—
World Development Agency 世界发展	40,41,42
机构,101—102,104	Labor rights and 劳工权利,37,39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经济论	TRIMs and,49
坛,83	WTO,见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世界	
环境组织,4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世界	
卫生组织,8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世界	
贸易组织,8,11,15,16,20,31,38,	

Z

Zedillo Report 塞迪略报告,52,54—
55,74,96

GEORGE S O R O S



ON GLOBALIZATION

- 全球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际机构的发展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同步，而我们的政治安排则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 市场是非道德范畴的：它们允许人们按自己的利益行事，并强制实施规定这些利益如何表现的规则，但对这些利益本身却不进行道德判断。然而，如果不对是非进行某种辨别，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
- 金融市场并不趋于均衡：金融市场需要看得见的手的引导，使这个市场的发展不至于出轨。
- 阿根廷的混乱局面可能使事态进一步发展。边缘国家资本短缺的不断加深，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报酬的不断攀升，将变得越来越严重。
- 世贸组织按规则供应私人物品的体系应由一个按激励方式供应公共物品的体系来补充。

ISBN 7-100-03623-2



9 787100 036238 >

ISBN 7-100-03623-2 / F · 446

定价：11.00元